

# 毛主席语录

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 内 容 介 绍

这本书收集了七篇文章，都是老工人讲他们的童年时期在旧社会的遭遇。旧社会里，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剥削阶级的手里，而他们却过着饥寒交迫的被剥削生活。这些老工人当初都是从小小的年纪开始，就为了生活到处奔波，有的在纺织厂、缫丝厂当童工，遭受资本家、工头的种种迫害和折磨；有的帮爸爸推粪车，风里来雨里去，受尽粪霸头、地痞流氓、伪警察的欺压和剥削；有的走上码头当“小野鸡工”，在包工头的皮鞭棍棒下搬运货物，压得身上磨去一层皮；有的进煤球厂当童工，在高高的煤山下，更是压断了筋骨累弯了腰；还有……

人人都有童年。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新中国少年儿童健康地成长，生活欢乐又幸福。但解放前的少年儿童是怎样生活的呢？文章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旧社会的童工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痛苦，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顽强斗志和反抗精神。看了他们童年的血泪生活，可以使我们受到一些阶级教育，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从而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同时，通过新旧社会对比，还会使我们更加热爱新社会，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 目 录

- 仇恨满腔忆童年····· ( 1 )
- 上旧码头做工的第一天····· ( 19 )
- 走在我过去被关押过的地方····· ( 33 )
- 流浪四方 受尽苦难····· ( 47 )
- 我跟爸爸推粪车····· ( 63 )
- 踏进纱厂第一“关”····· ( 77 )
- “打盆”童工的回忆····· ( 90 )

## 仇恨满腔忆童年

我是上海第二煤球厂的工人。这个厂解放前叫义泰兴煤球厂，我十四岁开始在这里做工，受尽资本家的剥削。每当我回忆起往事，几十年的遭遇就象放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红小兵们，现在你们要我谈谈我童年的苦难生活，满肚子的话一时叫我从何讲起呢？啊，对了！你们看，这前面不是有一排杨柳树吗？它已吐出了嫩绿的新叶，在阳光的沐浴下，晨风吹拂着它的枝叶，好象在歌唱、在舞蹈，给绿化地带增添了不少的生气。

可你们是否会想到柳树的叶子还可以吃呢？我小的时候，家里没吃的，就是摘柳树叶子来充饥的。但是在旧社会，吃柳树的叶子也不容易呀！我的哥哥就因为摘柳树叶子惹出了一场大祸来，我就从这里讲起。

## (一)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连年的灾荒，使我的家乡山东单县一片萧条。那时我们家穷得没有吃，没有穿，连房子也没有，住的一间破草房还是租地主家的。我爹娘起早摸黑为地主做工，不但不能养活我们兄弟几个人，还不够交纳这间破草房的租呢！

地主为了要我家祖祖辈辈为他做牛马，便以交不起租为名，硬要我大哥到他家干活顶租，说什么如果不去的话，就要弄得我们家破人亡。狠心的地主想要逼得我们走投无路啊！

我们不能再去当牛马了。当下爹决定带大哥到上海，找做工的舅舅设法找个工作，由娘带着我们四个兄弟暂时到姥姥家，等他闯出一条路以后再来接我们。

我们全家在一个除夕的夜晚，悄悄地离开了祖祖辈辈扎根的地方，指望能找到一条生路。谁知道，大家一分手，种种的灾难都压在我们一家人的头上。从此，我们一家就永远不能团聚了。

姥姥家里除了一张破桌，几块烂板，就是一只缺

了口的破锅。我们在那里就一面出去要饭或挑点野菜充饥糊口，一面等着爹的消息。

初春的一天，我跟三哥去要饭，跑了很多路还是空着篮子，心里饿得难受。走到村东头，看见几棵柳树长出了嫩叶，我们心想，这叶子也许能吃吧。三哥爬上树摘了许多叶子回家，我们把叶子拌上糠熬了吃。唉，这味道虽有些酸涩，还怪清香的，反正有东西下肚，妈妈高兴，小弟弟也不会尽哭。以后，我们就天天去摘柳树叶子当饭吃。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天三哥正爬在一棵树上摘着剩下不多的叶子，猛听得一声嗥叫：“穷小子，竟敢爬到老爷的树上来摘叶子，快给我滚下来！”三哥一惊，低头一看，原来是本村的地主狗腿子歪着脑袋在骂人，就顶了一句说：“这树是野的，为啥不能摘。”那狗腿子一听眼睛瞪得老大，说：“你这个野小子，瞎了眼啦，方圆几十里，哪一寸土，哪一棵草不是老爷的？简直无法无天，叫你尝尝老子的厉害。”说着，放出恶狗，三哥一急，从树上纵身跳下来，恶狗一头扑去，三哥跌倒在地。我冲过去扶起哥哥，举起木棍打狗，柳叶撒了一地。娘闻讯赶到，见三哥遍体鳞伤的摔倒在地，哇哇直哭，气得冲着狗腿子就骂：“你



们这号财主莫太欺人了。”狗腿子见我娘敢这样顶他，捡起一根树棍子朝我娘身上打去。娘跌倒在地，挣扎着要冲上去评理，这时乡亲们忙拉住我娘，说：“这世道穷人到哪里去评理？”娘又气又恨，当场口吐鲜血，从此种下了病根。

事情发生后，娘悲愤过度，经常吐血，三哥也躺着不能起身，饥饿、疾病又无情的夺去了二哥的生命。生活更加艰难了，娘不忍心眼看着孩子一个个饿死，最后忍痛把弟弟送了人。三哥跌伤的脚刚能挣扎着走动，就跟着别人到他乡谋生了，以后一直杳无音讯。家里只剩下我和娘、姥姥三人。

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天天等爹的消息，想不到等到的却是爹和大哥相继死去的噩耗。原来爹和大哥在砖瓦厂干活，一天要搬运万把斤的泥料，受不了繁重劳动的摧残，积劳成疾，先后在上海去世了。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成了泡影，娘哭得死去活来，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嘴里涌出。一连串的打击使娘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变得脸色惨白、眼窝深陷，经常昏迷不醒，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娘死了，一家人只剩下我和姥姥，一连串的不幸遭遇，使我恨透了吃人的旧社会，在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一道道的仇恨。

在家乡迟早要饿死，还不如去闯一条活路。这时听一个从上海回来探亲的同乡说，上海有一家叫义泰兴的煤球厂正在招工，姥姥就托他带我到上海谋生。在我十四岁那年，我怀着深仇大恨离别家乡，踏上了另一条艰难的生活道路。

## (二)

离了狼窝又入虎穴。到了上海，我的同乡把我带到义泰兴煤球厂。厂里有一个瘦猴般的家伙听了我的来历，象看货色一样，斜着三角眼上下打量我，



阴阳怪气地说：“义泰兴的饭可不是白吃的，能吃得下吗？”“这孩子在乡下担水割草什么都干。”我的同乡在一旁为我说话。我感到很气愤，这个家伙出口就侮辱人。这时只见他眉头一皱，捋捋几根稀疏的胡子说：“我正要招一批童工，那就留着，好好地干，一天三顿管你吃饱。‘义泰兴’是讲义气的，只要干得好，成家立业不成问题。”说着叫我在一张“关书”上按了手印，随即叫一个帐房先生丢给我一顶有号码的帽子说：“记住你的工号是‘303’，从今天起，你就去加煤。”说完就叫工头带我去干活。我从此开始在这个煤窝里当小奴隶。

我跟着工头出了屋子向车间走去，前面传来一阵低沉而缓慢的“噯唷，噯唷”的号子声，朝里望去，看见一座足有三层楼高的煤山堆在苏州河的岸边，不少衣服破烂、满身乌黑的工人在几块搭成“之”字形的跳板上鱼贯而行，把一筐筐的煤从苏州河的驳船上扛到煤山顶上。沉重的煤筐把杠棒压成弓形，虽是数九寒冬，他们头上却冒着热气，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走进车间，只见灰尘飞扬，电线横七竖八的，一部机器发出轰轰的怪叫，挺怕人的。来到车间尽头仓库的磅秤前，工头推了我一下说：“喂，你就

在这儿加煤球过磅，不准多加，多加要你的命！”我学着旁边老工人的样，蹲着身子用手把煤球扒到畚箕里，然后捧起一畚箕三四十斤重的煤球，踮起双脚倒进齐胸高的搁在磅秤上的箩筐里。蹲下去又站起来，站起来又蹲下去，连换一口气的空隙也没有。没多久我的腿肚子就开始颤抖，腰酸疼得直不起来，手指上的皮被煤球磨破了，煤屑和流出的血粘在一起，痛得我额上不断地沁出冷汗，但仍得硬着头皮继续干。

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开饭时间。饭领到手我不禁一怔，一股令人恶心的怪味直冲鼻子。那是些什么东西呀，尽是烂山芋、霉米和六谷粉煮的黑糊糊，上面还蒙着一层煤灰。工人们三三两两的坐着边吃边嘀咕，我肚子饿得发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三口两



口的把一碗酸溜溜的东西吃下去。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来装煤球的车子也渐渐地少了。我累得没有一点力气，就一屁股坐在煤球堆旁边。谁知道刚坐下一会儿，就听到“喀嚓”“喀嚓”的皮鞋声。“老板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我猛地跳起来，心里很奇怪，怎么老板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我刚坐下休息的时候就窜进了车间呢？还没等我拿起畚箕，头上已被棍棒“啪！啪！”地狠击了几下，顿时，我只觉得一阵眼花，耳朵嗡嗡作响，接着一只毛茸茸的手抓住我胸前的衣服向上一拎，衣服“嘶”地被扯破了一条，又猛地把向后推，我跌倒在煤球堆上，抬头一看，他就是早晨见到的那个瘦猴子。他横眉竖目，从牙缝里挤出一个个字来：“好啊！第一天上工就学会偷懒了，不想干就滚！”说完，哼了一声，扬长而去。我两眼狠狠地盯着瘦猴子的背影，说不出一句话来。一个老工人上前扶起我说：“小贾啊，在这里干活可要当心贼眼！”我有些不解，他接着说：“那人叫尤春欣，是厂里的经理，绰号叫‘尤猴子’，是个阴险毒辣的坏蛋，在他工务所门上装着一只单筒望远镜，不用出门，他就能监视整个车间工人的劳动。”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坐下一会儿就被他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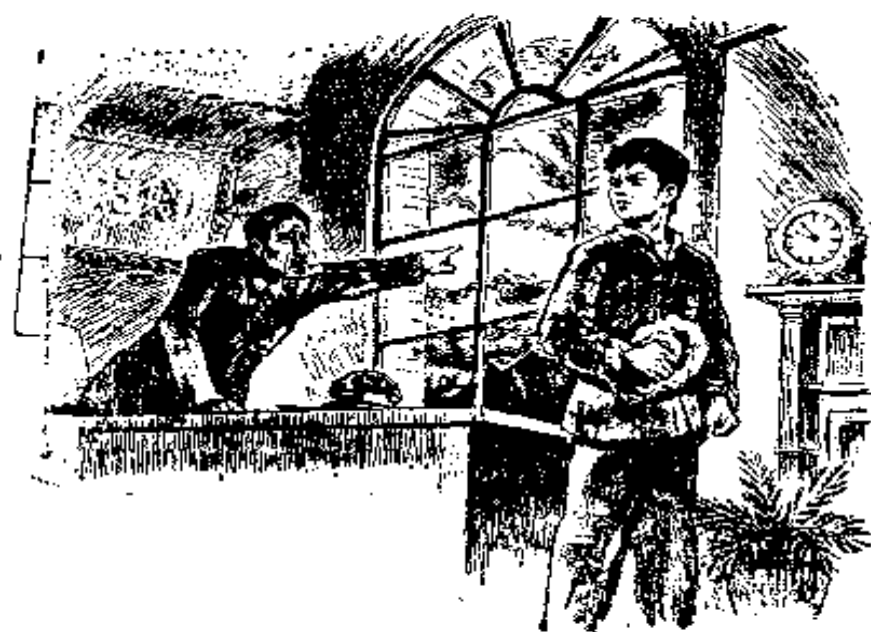
了。老板为了榨取工人的血汗，真是什么卑鄙的手段都使得出！我恨得把牙齿咬得“格格”响，顺手抓起两只煤球，一使劲把它捏得粉碎。

一天工作下来，我累得连东西也不想吃。人人一身污黑，象从染缸里爬出来一样。只见工人们挤在两个水龙头旁边擦身，冷得打哆嗦；有的工人拎着一铅桶冷水，从火炉里拿出一块烧红的铁往桶里一浸，等水灼热了，就擦擦身子；我只用冷水抹了抹脸，把出血的手指小心地洗了洗，重新包扎起来，就跟着工人老师傅一起来到睡觉的地方。跑到那儿一看，这那象睡觉的地方，这不是炉灶旁的一条走廊吗？寒冬腊月，滴水成冰，走廊四面通风，冻得受不住，许多工人都爬上一米多宽、五十五米长的炉灶顶上，用一张草包垫底睡觉。我也跟着人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带着满身的煤灰爬上炉顶，席地而睡。我浑身酸疼，一动也不能动，头上刚才被挨打的地方肿起了鸡蛋大的疙瘩，耳朵嗡嗡作响。小煤炭“乌龟”的命运落到了我的身上，今后我就要过这种生活了。煤窝里的日子真难熬呀，我真想离开这个黑魔窟，可是义泰兴煤球厂这条路很艰难，但去山东老家的路又何尝好走一些呢？我这个没爹没娘的孤儿跑出

去就只有四处漂流。为了盼到天亮，我只有强抑住心头的怒火挨下去。

我在煤球厂连续干了将近三年，身上的伤痕、鞭痕从来没有消失过。

一天工头对我说：“老板叫你去一次。”我惴惴不安的走进大楼，尤猴子见我进来，他眯着眼睛，又象我刚进厂时那样，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假惺惺地开了口：“你来了快三年了吧！嗯，人也长高了。”不等我思索这话的味道，就又接着说：“是这么回事，”尤猴子突然板起脸孔，吊起三角眼冲着我说：“你明天就开始扛煤去！”“扛煤”，这是厂里成年人做



的最重的活啊，顿时，我耳边响起“嗷唷，嗷唷”的号子声，眼前浮现着工人老师傅被沉重的煤筐压得弓着腰在跳板上摇摇晃晃的身影……“尤老板，我还是童工，这二三百斤的煤我扛不动。”尤猴子见我不愿干，三角眼里射出了凶光：“不想干？可以，你今天就给我滚，义泰兴不是慈善庙，供不起菩萨。”说完，把手一挥，就把我赶了出来。

第二天，我拖了根杠棒向煤山走去，一个老工人见我也来扛煤，跑过来用粗硬的大手抚着我的头，说：“孩子，这可是力气活，得慢慢来。忍着点，小心工头打啊。”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付童工的工钱，做成人的活，这是他们的老花样。尤猴子真是豺狼的心肠呀！”

煤山高高的堆着，几个满脸煤黑的工人正在把煤锹进箩筐，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位老工人也在锹煤，他向我打招呼：“来，到我这儿来装煤。”后来我知道他叫老金头，是个独身的老人。老金头总是趁工头不注意时给我装得浅浅的，对我非常爱护，怕压坏了我。和我在一起扛煤的那位老工人也总是把箩筐的绳子向自己一边挪，尽量减轻我的负担。尽管这样，我还是两腿发抖，腰也直不起来，走路摇摇晃晃、跌

跌撞撞地喘着粗气。没一会儿，累得我全身汗水直淌，连衣衫也湿漉漉的了。

挨到中午，我想脱下湿衣服，可是，一解开衣服痛得我心绞起来了。原来肩头已肿得象只馒头，皮早已磨破，脱衣服时血和皮被衣服糊住，一起拉了下来，肩头就象搁上一块火红的烙铁一样，痛得眼前金星直冒。我怕工头看见，连忙把衣服一垫又去扛煤了。这时肩上似乎压着一座煤山，我艰难的移动着脚，一步、两步……一颗颗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渗出来。忽然，我眼前一黑，只觉得天旋地转晕倒在地上，煤撒了一地，和我一起扛煤的那个工人也差点摔倒。老金头见了连忙跑来，摇着我的身子急喊“小贾，小贾！”直到我睁开无神的眼睛，他才松了口气。他关切地说：“小贾，你就在这里歇会儿吧！”他把撒落在地上的煤锹进箩筐，和另一个工人把煤筐送走了。

我浑身无力，全身的关节好象都松脱了，一点不能动弹，便坐在煤山下想歇一歇再扛。猛然，我被人从背后狠踢了一脚。顿时胸口发闷，痛得说不出话来。我刚抬起头，“啪啪”又接连几个巴掌，打得我耳鸣眼花，血顺着口角淌下来。“好呀！躲在这儿

偷懒来了！”工头凶神恶煞般地站在我的面前，煤山的边角里，尤猴子正在呲牙咧嘴地狞笑着。我勉强站起身来，用衣袖揩去了口角的鲜血，用力咬咬下唇，狠扫了他们一眼，扭头想走，那料畜生般的工头赶上来又是拳脚交加，嘴里骂道：“小赤佬，想走没这么便当，要你晓得我的厉害！”我瘦弱无力的身子哪里经得起毒打，我又跌倒在地。老金头和几个工人闻声赶来，见到这情景，个个怒火直冒。工头看见工人们一张张愤怒的脸色，才停住了手，假惺惺地说：“这次饶了你，以后再偷懒还要打。”老金头上来扶起我刚想离开，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的尤猴子突然开腔了，不阴不阳地说：“哪有这样便宜的事。”他上前看了看我帽子上的工号，对工头说：“关照一下账房间，扣掉‘303’号一元工钿。大家看着，拿我的钱吃饭不干活的，这就是例子。”说着，嗤嗤地喷出几鼻孔冷气，就摇摇摆摆地走了。我又气又恨，想冲上去跟他们拚了，可是人也站不稳，哪来的力气呢？老金头低声劝道：“孩子，记住这笔帐吧，现在这个世道没咱穷人说话的地方啊！”我只觉得天昏地暗，喉咙有些痒，一声咳嗽，一口痰吐了出来，低头一看，心里不觉凉了半截，被煤灰染黑的痰液里，几缕血丝清晰可见。我呆



住了，望着缕缕的血丝，只感到心闷气慌，心里充满着愤懑！我悲痛地扑在老金头的肩上，低声地抽泣起来……

长年累月的繁重劳动和残酷的折磨，就是铁打的汉子也要被折腾垮的。没隔多久，我肩头的红肿逐渐糜烂，背脊开始佝偻，双眼深陷，脸色苍白，人瘦弱得不象样。我有时半夜里盗汗，还常常吐血，十几岁的人象个小老头一样。我咒骂这黑暗的世道，压在我们穷工人身上的煤山啊，什么时候才能掀倒呢？

老金头见我人瘦小，又听说我没爹没娘，非常疼我，吃饭、歇工总和我在一起，我也把他当作亲人一样，有什么事总跟他商量，真是穷人心连心。他也常常暗底里跟我讲义泰兴老板是怎样剥削工人，搞投机买卖，由一爿煤炭店发家变成上海的煤球大王的，尤老板又是怎样凶狠对工人下毒手的，还千叮万嘱的要我当心。

一天，吃饭时间到了，我来找老金头，见他正指着十分陡峭的煤山向工头要求暂停锹煤，先整治一下。工头一听要停工，就破口大骂：“他妈的，想偷懒是不是？不能停。”我俩闷闷不乐地吃着饭，我问老金头：“这煤山有危险吗？”老金头愤愤的说：“怎么不危险？

你看煤山的南面已经挖得象峭壁一样。资本家拿我们工人不当人啊！”

下午，天际飘来一片乌云，太阳钻进了云层，风一阵紧似一阵，我接连扛了几箩煤，感到很闷，就敞开衣衫，用手掌抹了一把汗，背着空箩向煤山走去。才走了几步，猛听得前面“哗啦啦”一声巨响，接着几声惨叫。我吃惊地抽了一口冷气，只听得“救人啊！煤山塌了！”一片叫喊声，我急忙向前奔去，见几个人已逃出来了，就是找不到老金头。我连忙抱过一把煤锹，噙着眼泪同大伙一起拚命地挖着、锹着，老金头终于被挖了出来，只见他血肉模糊，殷红的鲜血不住地从嘴里鼻子里淌出来，和煤灰雨水混在一起成了黑浆，粘糊在脸上，面目也分不清了。大伙围拢来高喊：“老金！老金！”可是他再也不会应一声了。我悲痛地扑上去。闪电、惊雷和暴雨疯狂地咆哮着，似乎在控诉吃人的旧社会，替金大伯的死鸣不平。这时群情激愤，大伙一窝蜂涌向老板的工务办公室。尤猴子见了我们，开始一惊，接着就说，这是他自己不当心，吆喝我们快快上班。我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激愤叫道：“我们工人难道不是人吗？”大伙都随声喊了起来，当场责备资本家没有人性。在大伙的严厉目光的

威逼下，尤猴子才勉强答应负责收埋老金头的尸体。我们工人怀着对资本家的愤怒，带着沉痛的心情掩埋了老金头。在事实面前，使我懂得团结起来就有力量。

尤猴子对工人“闹事”耿耿于怀，总想伺机报复。一九四二年冬末，日本侵略军已到了穷途末路，变本加厉地封锁水陆交通，煤的来源很紧张，尤猴子就乘机裁减工人，经常制造种种借口，开除了大批工人。我也遭到了尤猴子的毒手。一天夜里，轮到我值班看守厂里的煤山时，老板串同工头搞栽赃的把戏，扔下一麻袋煤在煤山旁，诬赖我们几个工人连档偷煤。尽管我们怎么和他评理都没用，蛮不讲理的把我们的工帽收回去了。

我怀着悲愤沉重的心情走出厂门，沿着苏州河漫无目的地走着。上哪儿去呢？我看着苏州河混浊乌黑的流水，不禁悲愤万分、仇恨满腔！黑暗的社会、漆黑的天，上海已没有我容身之地了，我只得沿途求乞，回到了山东老家。

抗战胜利后，我在乡下听说上海的老厂闹复工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又进了上海义泰兴煤球厂。这时厂里资本家投机发财，生意兴旺，还专门派

人用小车子把煤球包送到用户家里，垄断了上海的煤球销路。我那时成了送煤球的工人，从此每天顶着星星出门，披着月光回家，一天下来头昏眼花，腿软腰酸，半夜咳嗽不停，胸口阵阵疼痛，生活上还是仍然吃不饱饭。在这节骨眼上，我结婚不久的爱人也从家乡出来了，家里又添了个小孩，我们的生活更困难了。贫困、饥饿、疾病始终围着穷人转，我终于病倒了。苦难的岁月何时才有尽头？我天天在盼望天亮见光明！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了，党和毛主席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过来，使我获得了新生。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九五二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今天我还在这个煤球厂做工，听着隆隆的机器声，看看厂里的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想想从“煤炭乌龟”变成新中国的主人，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每当我想起过去吃糠咽菜的苦日子，想起当年的童工苦，我是多么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啊！但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这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站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学着孔老二的腔调，在阴暗角落里狂叫

“克己复礼”。他的“复礼”，就是要在国内恢复被无产阶级打破的旧秩序，恢复剥削阶级失去的“天堂”，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我们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这是万万办不到的。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决不允许复辟旧制度，决不允许复辟资本主义。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我要认真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在抓革命促生产高潮中，更好地努力工作。同学们，你们多么幸福，党和毛主席为你们创造了这么好的读书条件，你们要为革命读好书，深入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散布的各种谬论，做革命的接班人，让我们一起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上海第二煤球厂工人贾师傅口述

毛佩青等整理

严忠林插图

## 上旧码头做工的第一天

电影《海港》里有一段唱词：“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同学们，你们站在码头旁，就可以看到老马师傅这段唱词所描绘的那种情景。这里吊车如林，机械成群，运输繁忙，一座座的起重机伸长着铁臂，矗立江畔，把一件件沉重的货物，轻巧地抓起来，送上送下，卡车、铲车、牵引车更是穿梭不停，代替了沉重的人力搬运。这里再也看不到折磨人的杠棒、“过山跳”了，再也听不见低沉凄凉的号子声了。

可是，旧码头是怎样的情况呢？码头工人真是干着累断筋骨的牛马般的活呀！肩运工人披着搭肩布，压在他们背上的是二三百斤甚至五六百斤重的货包；杠棒工人两人一档，有时几档、十几档的杠棒一齐抬，重量在千斤、万斤以上；扛煤工人一步一颤地行走在“过山跳”上，……繁重的劳动压弯了背，折

断了腰。小码头工的命运也一样悲惨，干一天活下来，身上磨去一层皮，拿到手的只是几个大饼钱。我第一次吃“码头饭”是在“大坂栈”（现在的上港七区）开始的。码头上一天的牛马生活，使我看到了摆在面前的是一条怎样艰难的道路啊！

记得我第一次上码头那天，正是最冷的“三九”天气。天还没亮，黑漆漆的没有一颗星星。我紧挨着父亲的身子，踏着冻硬的烂泥地向码头走去。西北风呼呼叫着，一阵阵沿着黄浦江面，贴着空旷的码头场地，无阻无挡地向我们扑来。

我们赶到码头门口，看见一大群工人早就排队等候在那儿了。他们和我父亲一样，一个个都穿着补钉加补钉的破衣衫，有的肩上披块烂麻袋片，有的头上戴顶开了花的破草帽，站在刺骨的寒风里，不住地跺着脚。父亲和几个工人打着招呼。我后来才知道，好些工人为了能拿到一张干活的工票，已经在这里等了大半夜了。

父亲把我带到一旁，蹲下身来，替我紧了紧扎在腰间的一根草绳，又把自己头上的那顶旧毡帽脱下来给我戴上，说：“孩子，你先跟爹在这暖一会，等一会包工头来了，我再领你去‘考试’。”“考试”？进码头

干活还要考试？那时，我冻得直打哆嗦，也顾不得想这些。

原来，那时的大坂栈码头是个装卸各种杂货的码头。大的货物有几百斤重，小的也有三四十斤。码头上的资本家为了赚更多的钱，雇了一批童工，专扛小件货物。同样干一天活，童工的工资还不到大人的四分之一。这样还不够，进码头做工还要经过“考试”。这“考试”，决不同现在学校里的考试。现在学校里的考试，是同学们向毛主席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那时码头上的“考试”，是资本家、包工头对工人的一种侮辱，一种迫害。资本家、包工头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待，而是当作会说话的牲口来使用。什么“考试”，就是试试你的力气，你的脚劲，看你能不能替他们卖最大的力，替他们赚更多的钱！所以，那时候进码头，不论大人、小孩，都要经过这一关。

过了好一会，码头的大门“咣啷”一声开了。排队等候的工人“轰”地一下拥向门口。父亲急忙牵着我的手，跟着人群，挤到码头的大门口。门前站着一个胖胖的歪戴呢帽的人，父亲把我拉到这人的跟前，和他讲着什么。这人身穿一件黑色的短大褂，密密的一排扣子象一条大蜈蚣爬在胸前。他的手一伸把



我拉到一边，眼睛斜眯着，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遍。突然，他撩起脚猛地在我的膝盖上踢了一下。我腿一软，差点儿跌倒。“嗯，脚劲还不错，跟我走吧！”我恨恨地瞪了他一眼，不理睬他。父亲跑到我跟前，替我揉了揉膝盖，轻轻地说：“这就是包工头。你就跟着他去吧。爹要到大船上去扛活，没法照看你。你可要自己小心，啊？”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泪水在眼眶里滚着。

从此，我就当上了小码头工。那时我才十一岁，个子不过和现在小学三四年级同学们差不多。

我被带到一座仓库的楼梯下，只见那里已经站着几十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男孩子。楼梯下黑呼呼的，谁也认不清谁的脸，大家都默不作声。一阵风吹来，只听好多人的牙齿在“得得得”地打抖。那包工头手里扬着一根鞭子，嘴里吆喝着，可是，谁还顾得去理会他。

不一会儿，开始干活了。我被叫去滚柏油桶。那油桶足有五六百斤重，由大人们“吭唷吭唷”地打着号子从船上抬下来，再让童工推着滚到仓库里去。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推了起来。我的手一触到油桶，就象触电似的缩了回来。原来，那油桶外面裹着薄

薄的一层冰！我禁不住连打了几个哆嗦。正犹豫着，背上“拍”的一声，挨了一下子。我痛得跳了起来，回头一看，只见那个包工头恶狠狠地瞪着眼：“快干！呆着做什么？”我咬了咬牙关，只得推了起来。

天渐渐亮了，我前后一看，只见伙伴们都埋着头，吃力地在推着。沉重的油桶在坑坑洼洼的泥地上滚着。我推一下油桶，手掌就象被针扎一下似的痛得直钻心。一看，原来手心的皮被粘去了一大块。我咧着嘴，往手心吹气，可我不敢停下来。我一停下来，后面几个人也要停下来，包工头就会跑来打骂人。推着推着，我手冻得麻木了，渐渐也就不知道痛了。



好不容易推到了仓库门口。那儿有一个斜坡，我前面几个伙伴，使劲地推着油桶，上去了。可我推到一半，却怎么也推不上去，出门时只吃一碗薄菜粥，力气都用光了。我使出浑身的劲儿往上推，油桶还是上不去。顶了一会，吃不消了，油桶往下溜，我只得往旁边一让。油桶滚了回去，撞在后面滚上来的油桶上，差点轧着小伙伴的脚。那孩子抱怨起来：“看，你一个推不上去，拦了我们一大串！”我回头一看，果然后面几个伙伴都停了下来。这时，另一个小伙伴走到我跟前：“嘿，准是个新来的，我帮你推上去！”我一看，哈，这不是一起捡过煤渣的小五子吗？我高兴地喊：“小五子！”小五子认出是我，高兴地用手掀了掀我头上的那顶旧毡帽，说：“是你呀，戴着这玩艺，我都认不出来了。来！一、二、三——”

两人用足力气，才把油桶推进了仓库。我喘着粗气从包工头手里，接过一根竹片做的筹子。小五子见我手上破了皮，替我去捡来一张旧包箱纸裹在手上，并告诉我：推上斜坡要快，猛一使劲冲上去，不能慢吞吞的，一停就费劲了。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小五子比我大一岁，个头和我差不多，人瘦些，却很机灵。他很懂事，待人接物象个大人似的，和一

起做工的小伙伴都很合得来。一个上午，我就和他两人一前一后地一起推油桶。

中午，吃午饭时，工人们都跑到码头门口的小摊上，凭筹子赊大饼吃。小五子赊到两只大饼；我人头生，筹子又少，只能赊一只大饼。我早饿极了，三口两口的就吞下肚了。小五子见我吃完了，又分给我半只大饼。我不要，他硬塞在我手里：“以后你请客，我也不客气。”

接着，他问我：“你怎么不捡煤渣，也到这里来了呢？”提起捡煤渣，我还差点给恶狗咬死呢。

那时候，码头工人整天干着牛马不如的活，可得到的工钱却连自己也吃不饱。码头工人悲愤地说：“上码头，扛货包，不养老，不养小，养个中年吃不饱。”所以，只要自己的孩子稍微大了点，就让他出去拾荒要饭，或者捡煤渣，帮着家里减轻一些担子。码头上穷工人的孩子都早当家啊。

每天晚上，待到下半夜的时候，我们十几个穷孩子，由小五子领着头，象捉迷藏似的从码头的铁栅门底下钻进去，蹑手蹑脚地避过门警，溜到码头上捡煤渣。天不亮前，把捡来的煤渣到黄浦江边洗一洗，再到大饼摊上换饼吃。

可是码头上的资本家、包工头胡说穷人的孩子进码头会偷东西，连捡煤渣都不许。他们养了一条比小孩子还高的狼狗来看守码头。一起捡煤渣的小伙伴中，就有两个被那恶狗咬伤死去。以后，小五子的爹妈不让他再捡煤渣了，想办法让他上码头干杂活去。可我因为人小没有别的法子，只得加倍小心，拚着命仍旧去捡煤渣。

再小心也没用，大祸终于临到了我的头上。一天深夜，我刚摸到码头上，忽然听到背后一声喊：“捉小偷！”随着喊声，一条狼狗“嗖”的一声窜了过来。我拚命地往黄浦江边跑，心想只要跑到黄浦江边，就不怕这恶狗了。谁知快跑到江岸时，冷不防被一个什么东西绊倒了。我回头一看，见是那条恶狗咬住了我的腿，顿时，一阵剧痛直钻心头。我拚命地挣扎着，爬向江边，一头翻进了滚滚的黄浦江。

等我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一条小舢板上。原来是一位摇舢板的叔叔把我救起来的。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去捡煤渣了……

小五子听了，也恨得咬着牙、捏着拳头说：“那条狗真可恶！”这时，父亲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只大饼，并吩咐我晚上干完了先回家，他还要连着干活。

说着就匆匆上船去了。我把大饼也分了一半给小五子,说:“你嘴渴不渴?走,我们喝点水去。”走到茶桶前一看,桶底早已朝天了。我们只得一起来到黄浦江边。好些工人也蹲在江边喝江水,我用手捧起混浊的江水,喝了几口,那水冰凉冰凉的,一直凉到牙根。

同学们,你们听了一定会奇怪,这么脏的黄浦江水怎么能喝呢?旧社会的码头,哪象现在呀,到处都放着保暖桶,天冷有滚烫的茶叶水,天热有清凉的柑子水、酸梅汤。那时,资本家、包工头只知道剥削工人赚钱,哪管这些事。后来,工人和他们斗争,才去“老虎灶”打来两桶温水。人多水少,哪里够喝?有时渴得没办法,喉咙干得象要冒火似的,还是要喝黄浦江的水。

我们两人蹲在江边,还没喝畅哪,包工头就在后面喊了起来:“快!快点干活了!”

下午,换了一种活,背芭蕉扇了,背一百捆芭蕉扇才拿二十个铜板。一捆芭蕉扇三四十斤重,有我人那样高。我虽然长得不算瘦小,但毕竟只有十一岁,一捆芭蕉扇压在背上,腰挺也挺不直。平地还好走,上跳板、爬楼梯可就费劲了。走在晃呀晃的跳板

上，我的腿直发抖。我屏着气，牙齿深深地咬进嘴唇，艰难地移动着步子。因为小五子告诉过我，如果让包子从背上翻下来，就要遭到包工头的打骂。所以，我只得拚命地硬撑着。

就这样背啊、背啊，背了一捆又一捆，累得我汗水湿透浑身衣衫。我多想歇一会呀！可是不行，包工头象催命似的紧钉着喊：“快，快，别死样怪气！”

走在我前面的小五子也累得不行了，他边抹汗水边骂：“这些狗杂种，为了提早开船，好拿‘快卸费’，连气也不让喘！”

快近傍晚时，我实在吃不消了，肚子也饿得咕咕叫。我背着一捆芭蕉扇，刚踏上仓库二楼的最后一层楼梯，眼一黑，脚一软，连人带包一齐摔倒在地上了。我正挣扎着想站起来，包工头的鞭子已经落到身上了：“小赤佬，你想不想干？不想干早点滚！”我忍着痛，止住泪，硬挺起身来，刚想把倒在地上的芭蕉扇扶起来，继续背到堆桩的地方。不料头上又挨了一巴掌：“‘小野鸡’，你哪里来的，码头上的规矩懂不懂？快滚下去重背！”原来，按那时码头上吃人的“规矩”，扛一包货如果不一口气扛到堆桩的地方是拿不到一根筹子的，半路上一歇脚这一趟就算白干。

我气愤地用力推倒芭蕉扇，狠狠吐了几口唾沫，走下了楼梯。

快放工的时候，谁知小五子出事了。

小五子干得实在太累了，背着一捆芭蕉扇，靠在仓库边的一个货堆上想歇一会。不想一歇就打起瞌睡来，包子从身上滑了下来也不知道。可恶的资本家、包工头一等天黑，就放出狗来巡逻了。那狗转到货堆旁，一口咬住小五子的腿就往外拽。包工头闻声赶了过来，不问三七二十一，挥起鞭子就抽。小五子一痛一急，把腿使劲一收，连裤腿带肉撕下来一大块。小五子一声惨叫，顿时昏了过去。

做工的大人闻声都围了过去。我急忙挤进人群一看，只见小五子躺在地上，脚旁边一大滩血。“小五子！”我扑在他身上喊着。几个工人气愤地责问包工头为什么放狗咬孩子。那家伙一声冷笑：“哼！你问他自己。这狗专咬偷懒的人！”

我抬头一看，啊！正是那条恶狗，眼睛里闪着吃人的凶光，大嘴里伸着血红的舌头。

“这孩子累成这样子，你还说他偷懒？”包工头听到工人用话顶撞他，一时眼里露出凶光，正待发作，但一看工人们都围住他，用气愤的眼色盯着他，



不禁有点慌张，嘴里不干不净地叫骂着：“小赤佬，这回饶了你，……”一边说着，一边牵着狗挤开人群溜了。走出几步路，才回过头来嚷道：“都围着干什么？快干活去！”但谁都不理睬他。

我抱着小五子摇着、喊着：“小五子，小五子，你



快醒醒！”一个工人把我拉开，从地上抱起小五子，说：“快！先送他回家，等会再找他们算帐。”

我呆呆地望着地上的血迹，摸着自己脚上刚刚愈合的伤疤，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第一天上码头，我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整整做了十三四个小时。我背上的皮全都磨破了，衣衫贴在上面，用力一脱，血直往外流。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往家走，回头望了望阴森森、黑漆漆的码头大门，觉得它好象那条恶狗的血盆大口！西北风呼呼地嘶叫着，从背后袭来，钻进我的袖口、领头、裤管。我却不觉得冷，只感到头昏沉沉的，小五子被狗咬伤流下的一滩血总在眼前忽闪忽闪的。

母亲迎着寒风，站在弄堂口等我。我见了母亲，再也忍不住，大声地哭了起来。母亲心疼地搂着我，她也哭了。父亲直到深夜才回家，他见我手上、背上磨去一层皮，恨得牙齿咬着嘴唇，说不出话来。可是为了生活，第二天，我还得上码头去做童工，……我年年月月码头上奔波，风里来，雨里去，受尽折磨和迫害。解放前，在那暗无天日的凄风苦雨中，我的脸上从来没有露过一丝笑容。如今，看着这繁忙的码头，看着我们工人用勤劳的双手建设起来的雄伟

壮丽的新海港，我总是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人也越活越年轻了。可是，叛徒、卖国贼林彪叫喊要“复礼”，妄想复辟资本主义，让地主资产阶级、恶霸工头重新骑在我们头上横行霸道；使我们重新做奴隶，吃苦受罪，这是坚决不答应的。一切反动派妄图搞复辟、开倒车，都是痴心梦想，我们要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批倒、批臭孔孟之道，深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

上港七区装卸工人李师傅口述

区工人写作组整理

夏予冰插图

## 走在我过去被关押过的地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公检法有关部门邀请了一批工人参加清理档案工作，我被派到了卢湾区公检法机关。在欢迎的锣鼓声中，当我走进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大门时，心情异常激动，不禁热泪盈眶。你们那里知道，我这个旧社会的“清道夫”，曾经两次被反动派关进这里的监狱，受尽凌辱和折磨。看着面前这样大的变化，我怎么能不激动呢？那时候，我们这些被压在旧社会最底层的“清道夫”、“黄包车夫”、推粪车的、拾垃圾的劳动人民，经常遭到反动巡捕、伪警察的棍棒毒打，并找种种的借口把我们关押起来，至今我们身上还留着条条伤痕。审查着那些过去欺压人民的阶级敌人的档案材料，翻看着一页页记录了敌人血腥暴行的罪证，我仇恨满胸膛，旧社会遭受的苦难一桩桩涌上心间……

我十二岁那年从苏北来到上海。

那时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他们到处划分势力范围，什么英租界，法租界……肆意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劳动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有一年，我的父亲带着一家人从苏北逃荒来到上海，在法租界当一名清道夫。有一次因为没有按时扫干净马路上的垃圾，被租界里的工头毒打了一顿，当场吐血不止，抬回家时就死了。终年生病的母亲经受不了这个打击，不久也连病带饿含怨离开了人间。一家人留下了我和六岁的弟弟，孤苦伶仃，相依为命。

父母死后，我和弟弟举目无亲，回苏北老家也没有活路可走，只得以讨饭为生。白天，我领着弟弟走街串巷，挨门讨饭。讨到饭，我总是先让弟弟吃；讨不到饭，就从泔脚缸里捞点剩饭残羹充饥。遇上风雪天，挨饿受冻的苦日子，更是难熬。痛苦的生活折磨得我面黄肌瘦，不象人样子。

• 邻居的叔叔婶婶看着我们兄弟俩的遭遇，无不心痛流泪，可怜我们。眼看着我们这样难以活下去，有个邻居叫阿庆的叔叔给我出了个主意，说是贩卖山芋，一天下来赚几个小钱，能顾得住我和弟弟吃两

顿薄菜糊，同时给了我几个钱作本钱。我接过阿庆叔的钱，喜出望外地跑到乡下买了点生山芋，又忙了半天，准备第二天去摆摊头。

第二天早晨，天不亮我就煮熟了一小锅山芋。我把山芋装在盆子里，看着红艳艳、鲜灵灵的正冒着热气，又散发着香甜浓味的山芋，真讨人口馋。我推醒弟弟说：“天亮了别乱跑，我去卖山芋了，一会就回来。”弟弟一看到热气腾腾的山芋高兴地叫道：“阿哥，我要吃山芋，我要吃山芋。”

“这山芋不能吃，吃了就卖不到钱，以后要饿肚子。”我跟弟弟商量。弟弟很听话，不再吵着吃山芋。

我端着热气腾腾的山芋，迎着瑟瑟的晨风走出弄堂口。我边走，边盘算：卖掉以后，能赚到几个钱就去买六谷粉，再到菜场上捡点烂菜叶，回家煮一锅菜糊。嗨，今天我和弟弟可以饱吃一顿，不要挨门讨饭了。

这时，昏暗的路灯还没收敛最后一息残光，马路上冷冷清清，依稀走着几个上早班的工人。我来到“蓝维霭”路（现在的肇周路）路口，在边角上摆起了小摊头。我怕山芋冷掉，脱下破棉袄盖在上面，不停地向过往的行人吆喝：“买山芋呀！买山芋呀！”吆喝了

一阵，不见有人来买，冷飕飕的风吹得我浑身发抖。我焦虑起来了。山芋，有钱的人是不吃的，只有一大早饿着肚皮拉黄包车的穷工人才会偶尔买一块充充饥。是不是我今天起得太早了……正想着，忽然，“喔——嗤”，一辆汽车在我的小摊前刹住了。我一看是红头“香港车”（法租界巡捕房抓人的车子），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捧起小摊头就要跑。因为平时马路上的小孩子常常在唱：香港车，滴滴滴，里面坐着法兰西；不行正道不讲理，专对穷人发脾气；见了“香港车”，快快远远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几个巡捕跳



下车来，一个个手里拿着警棍，气势汹汹地嚷着：“小赤佬，竟敢在这里摆摊头……”说着，“啪”一棍子打在我的背上，几个巡捕如狼似虎，不由分说地把我拖上车，装山芋的盆和小凳被踢翻在马路旁。同车的有三个穿着破烂衣服的中年人，他们痛苦地望着车厢里一堆烂糟糟的黄鱼；还有两个拾垃圾的和我一样大小的孩子，缩在角落里，吓得泪流满脸；我们都是无缘无故被抓来的。“香港车”很快就开进了“薛华立”路（现在的建国中路）法租界巡捕房。

法租界巡捕房是座五层高的大楼。早晨，大楼被灰色的淡淡的薄雾笼罩着，显得十分阴森恐怖。大门口外站着几个身材粗壮的巡捕，个个象凶神恶煞，恶狠狠的瞪着我们这些被抓来的“犯人”。我们都被赶下车来，走得稍为慢一点，那些狗家伙就拳打脚踢把我们往前推，被磕得脸青鼻肿。被激怒的三位阿叔用仇恨的目光怒视着那些穷凶极恶的巡捕，我们几个小孩也不哭鼻子了，昂起头，挺起胸，表示不畏惧的样子，偎在大人的身边一起走。那些帝国主义的看门狗——巡捕，特别会欺侮小孩，看我们走得慢，攥住我们的头发就往牢房里推，还满口骂着下流话。顿时，疼得我眼前直冒金花，我咬着牙，不哭也不叫，



用手使劲掰那家伙的手，用小脚踢。可是因为我人小力弱，终于被那胖家伙拉到一个囚室门口，用力一推，我一个跟头栽到里面，鼻子被磕的生疼。这样欺侮人，我爬起身来，追到门口，真想去咬那家伙几口，心里才解恨。同来的阿叔也被推了进来，他们怕我吃亏，拦住了我。这时候门也“碰”的一声关住锁上了。

我握紧拳头，怒视着紧锁的牢门，我气，我恨，鼻子的血顺着下巴往下淌，我都没有感觉到。还是同来的阿叔用破棉絮给我塞住鼻孔，擦去了血。看到殷红的鲜血，我掉下了几颗仇恨的眼泪。那时候，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是这样的没有自由！

我们被关的囚室是巡捕房大楼的最底层，里面没有窗子，只有从门缝里透得进一线亮光来，阴暗阴暗的，地板又潮湿得象泼过水一样，不好躺，不好坐。我顾不得身上的伤在发痛，只注意听着外面的动静。这时，我心里惦念着弟弟，不知他会不会找到巡捕房来哭闹。

“香港车”每隔一二小时回来一趟。回来一趟就叫骂声不绝。约莫十点钟左右，我被关的牢房里又塞进了七八个人，其中有大人也有小孩。“哎呀，我的

腿呀！”外面传来一声惨叫，不知是谁又遭到巡捕的毒手了！痛苦的叫喊声真是撕碎人的心。

我们被关在牢房里，一天没吃一口东西，没喝一口水。狭小的牢房里关着的都是做小生意、捡垃圾、拉人力车的一些所谓违反法租界秩序的劳动人民，人多地方小，并且屎尿拉尿都在里面，空气混浊，恶臭熏人，一天比一年还难熬啊。

天色慢慢暗下来了，牢房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是第一次坐牢，心里害怕，就问旁边的一位阿叔：“我们会在这里关押多久？”

“小弟弟，你是第一次被抓来的吧？”

“嗯，可我没犯罪呀！我只摆个摊头卖点山芋……”

“是呵，豺狼当道，不讲理呀。我也是因为摆黄鱼摊头，平白无故被抓来的……”

原来法租界以整顿“市容”为名，订下了种种的“法律”来欺压劳动人民，进行敲诈勒索，所谓“违法”被抓来的，就没收货物，搜走钱钞，关押一天一夜。

夜深了，我坐在牢房潮湿冰冷的地上，惦念着弟弟。我一天没吃东西，肚子在叽哩咕噜地叫，头皮

和鼻子都火燎般地疼痛，怎么也睡不着觉，早晨离家时的情景又在眼前出现了。

“阿哥，我要吃山芋……”

“……”

啊，弟弟怎么样了，他饿了一天了，会不会出来找我，撞上汽车，或是被坏人拐走……我不敢想下去了。弟弟是我唯一的亲人，如果真的出事情，我对不起死去的父母。想到这里，我挣扎着爬到门旁，把头伏在门上，隐隐约约好象听到弟弟的哭叫声。其实，门外只有巡捕来回走动的皮鞋声在“喀嚓”“喀嚓”地响。

我静听着，静听着，恶臭阵阵袭来，瘦弱的身体经不起一天多的折磨，以后便昏昏沉沉失去知觉了……

第二天拂晓，我在恶梦中被巡捕的“快滚，快滚”一阵嚎叫声惊醒。原来他们天天抓人，每天总要放一批关一批，我们被释放“出狱”了，又轮到另一批无辜的穷人遭罪了。我走出黑黝黝的巡捕房大门，急急忙忙奔回家找弟弟，推开破破烂烂的家门一看，糟糕，弟弟不在，上哪去了？我着急地站在门口喊叫。随着叫声，从外面跑进来一个小孩，我一看是弟弟，紧

紧地把他抱在怀里，悬着的心象一块石头似的落地。

接着邻居也来了一大群，围住我问长问短。原来我被关进巡捕房，弟弟等我不来，到处哭着找，被隔壁一位老大妈领回家，过了一夜。真是天下穷人心连心，在那黑暗的世道里，只有穷人帮穷人。

卖山芋的“生意”不能做了，我和弟弟只得另找生路。

贫困、饥饿无情地折磨着我们兄弟俩，我们两颗小生命，随时都有被吃人的旧社会吞没的可能。

抗日战争以后，劳动人民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和弟弟都长大了几岁，但是生活也更苦了。为了找个事做，能吃到一口饭，我靠亲友的帮忙，才在一个姓沈的工头手下，找到一份清道夫的工作，穿上了“红马甲”，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穿上了“红马甲”，并不是从此生活就有了保障。清道夫每天低微的收入只有伪币四角钱，换不回两斤六谷粉，再除去柴火油盐钱，剩下无几，别说养家活口，就连自己的嘴巴也糊不住。那种日子，真是黄连树上挂猪胆，苦透了。所以我白天扫马路，晚上还得拉黄包车或是干别的杂活，才能勉强混日子。

即使这样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工头还要挖空心思进行敲诈勒索。强迫我们清道夫穿“红马甲”就是一种很毒辣的手法。一件红布制的、背后印着号码的马甲，套在我们工人身上，就象枷锁一样束缚住了我们的手脚。平时，工头骑着自行车满街转，远远监视我们，只要看见那个清道夫干活累了歇一歇，就抄去号码；连小便跑开一步，也说你偷懒，抄下号码……凡是被抄去号码的，除了扣工钱还要挨骂挨打，一个月莫明其妙的不知要被扣掉多少钱。还不止这样，逢年过节要给工头送礼，工头家里死人或是有谁结婚，发帖子下来，就要我们送钱；要这样的钱，要那样的钱，流血流汗挣来的几个工钱，在工头的明抢暗夺下，还能剩多少呢。如果有那一次应付不周到，这些吸血鬼就会想出歪点子来刁难工人。有一天，我正在一个桥头旁扫马路，姓沈的工头在附近蹒跚蹒跚地转过来；工头这类坏家伙是不会关心工人的，平时尽使坏主意敲诈工人，今天在我劳动的地段转悠转悠，我知道是不安好心的，我心里在提防他。

事过第三天的中午，天气有点热，我想脱掉旧棉袄车走垃圾。可是当我刚脱下罩在外面的“红马甲”时，姓沈的工头象游魂一样不知从哪里窜出来，恶狠

狠地嚷道：“201号，你揩油，不干活。”说着，抢去了我的“红马甲”就要走。

拿走了“红马甲”就是要停我的工作。“谁不干活？你看清楚没有？”我又气又急，上前一步拉住他，夺回了“红马甲”。他见我敢抢回“红马甲”，就怒气冲冲地要动手打人。在路旁修下水道的马路工人，见他那样横蛮，都愤愤不平，围上来责问他。他看到这样人多势众的场面，慌了手脚，一面溜走，一面装腔作势地说：“这次饶了你……”

到了月底领工钱的时候，帐房硬扣下我半个月的工钱，说是姓沈的工头关照的。这样蛮不讲理，我正要开口责问，领工钱的小窗口的门“嘭”的一声磕上了。我心里又气又急，只领到半个月的工钱怎么生活呢！我路过当铺，把心一横，脱下身上的旧棉袄往柜台上一送，换了几个钱。

当掉了旧棉袄，身上又冷又饿，回到家里，冷冷清清的一点吃的东西也没有，出去捡煤渣的弟弟回到家里没有饭吃准要吵闹。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出去多拉几趟黄包车再赚点钱过日子。于是我跑到车行租了一辆黄包车，遭受车行老板的另一种剥削。

牛马干完一天活，还有个上槽吃料的时候，我扫

了一天马路，晚上还要拖着又饿又累的身体去拉车，真是比牛马还不如呀！西北风呼呼叫，我穿着单衣披着破麻袋，等人家喊车，在街角里冻得直打哆嗦。

旧上海的酒楼饭馆这些豪华的地方，是有钱人进进出出的场所，我们拉黄包车的就在附近等人雇车。呼啸的西北风阵阵吹来，冻得我不停地跺脚，饿得肚皮咕噜噜叫。好不容易从街角对面酒馆里，钻出一个身穿长袍，头戴铜盆帽，胖得象猪猡一样的阔老板，拄着文明棍一摇三摆地向我走来，“喂，拉车的，送到外滩。”那家伙坐在车上，叼着一支雪茄烟，敲着文明棍一路催我“快跑，快跑”。我冻裂的双脚，连双草鞋也没有穿，张着一道道血口子，走在高低不平的冰冷的弹子路上，不住地往外渗血，疼得钻心，每走一步留下一个血印。为了赎回当出去的旧棉袄，为了能吃到一口饭，我还是忍住疼，使劲拉着车往前跑。经过“薛华立”路，我想从一条弄堂抄近路过去。可是当我刚把车子拐进弄堂口，那家伙暴跳如雷地叫起来：“往那里走？”

“走这条路近，可以快点到外滩。”我气喘吁吁地说。

“胡说，我看你是串通坏人要半路抢劫。”

“先生，天刚黑，这里不会有剥猪猡的。”我还是向他解释。

“妈的，你还敢骂老子。”那家伙以为我骂他“猪猡”，说着，文明棍抽在我背上。这样不讲理，这一下激起了我胸中的怒火，我横了心：你不给我活，我也不让你好受。我连忙放下车把子，准备跟他较量一番。这当儿，那家伙又举起文明棍第二次打来，我就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当胸一拳，又一推，那笨家伙仰面倒下车去，摔得“哇哇”





乱叫。这时，在“薛华立”路上巡逻的一个伪警察闻声跑来，看见我是拉车的，就手舞警棍，不问青红皂白地劈头向我打来。我一闪身没有被打着，这时又有几个伪警察接着跑来，其中有两个赶忙搀扶起那个胖家伙，别的却都向我包围过来，七手八脚地扭着我的胳膊，连打带骂把我送进上次被关过的那间牢房里，……我第二次又被无理的关押起来。

不过，这时它已经换了牌子——伪警察局。

从巡捕房到伪警察局，不过是换换牌号而已，它们的实质却是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反动派镇压劳动人民的工具。解放以前这个地方，多少年来，关押过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动人民，记下了累累的血债……

如今，这里早已回到了无产阶级的手里，成为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强大专政工具。我这个旧社会的奴隶，新中国的主人，走在被反动派欺压过的地方，想想过去，看看现在，心坎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幸福！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江山，我一定要以昔日的血泪仇来鞭策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努力工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

上海市卢湾区清洁管理站工人高师傅口述

姚淑芝、潘宪立整理 王劭音插图

## 流浪四方 受尽苦难

每年学校放暑假,或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在我们的客轮上,经常活跃着一些没有家长陪送、单身出门的小旅客。这是我们上海客运站为了便利支援外地建设的同志和家人团聚,新增加的一个服务项目:办理小孩托运。这些孩子大多是第一次离开家门的,在航行途中,祖国美丽的山山水水,引得他们说笑不停,目不暇接,兴奋得忘了旅途的疲劳。孩子们坐上了轮船,在欢笑声中度过了旅途生活,最后平安地到了亲人身边。他们的幸福生活是多么令人羡慕啊!每当我完成了航行任务,走下驾驶台,看到他们站在甲板上,瞪大眼睛,指指点点眼前新奇有趣的一山一水时,我总爱走过去凑凑趣,当个“义务讲解员”。他们对着大自然的景色,问这问那,笑声朗朗,显得天真活泼,在这时候,我处在他们中间,真是分享着一份快乐。和孩子们在一起,看到他们幸福的童年,

往往唤起我对旧社会悲惨遭遇的回忆。

解放前，我家住在虹口。全家四口人，爸爸、妈妈、哥哥和我。爸爸在一家糖果店当临时工，每天起早摸黑地给资本家干活，满心希望能用自己的血汗换取一家人的温饱。可是，在旧社会里，那有穷人的活路走。他到处奔波，所挣得的一点钱，别说养活不了一家人，就连他自己也是在半饥不饱的生活中挣扎着。由于长年困顿的生活，折磨得我爸爸骨瘦如柴，一身重病。过了不久，就含恨死去。我爸爸死后，生活更加困难，妈妈就求亲告友，介绍哥哥到一家杂货店里当学徒，她自己则成天泡在水里，帮人家洗衣服。当时我才十一二岁，每天在外面拾垃圾捡煤渣。尽管这样，一家人拚死拚活的干，吃的是照得见人影的稀菜粥，住的是难以避风雨的破草屋。可是就连这种牛马般的生活，旧社会也不让我一家平平安安的过下去。不久，我家又飞来一场惨祸。有一天，天刚黑不久，哥哥吃力地拉着一车货走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突然上来一帮人把我哥哥打伤，抢走了货物。结果，老板硬说是我哥哥串通流氓抢他的货物，告到伪警察局，把我哥哥抓进了监狱。哥哥在狱中受尽了拷打，连气带病，不久就死在狱中了。

爸爸、哥哥相继惨死以后，家中只剩下我和妈妈两人相依为命。极度悲愤的妈妈，哭干了眼泪咬碎了牙，她恨不得把那暗无天日的旧世界砸个粉碎。妈妈为了活下去，把我扶养成人，不得不拖着虚弱的身体，带着我照旧帮人家洗衣服，把她用血汗所换得的一点钱，买回一点米和糠，掺在烂菜叶里，一起煮着吃，过着半饥不饱的苦日子。有一次，我给人家送去洗好的衣服回来，妈妈见我一进门，就慌忙站起身来，把她正在吃着的饭碗顺手藏在身边的破碗橱里，然后便给我盛饭。当我接过妈妈手里的碗，看到妈妈那苍白的脸色，想起妈妈平时吃饭总是避着我的情景，不禁对她刚才的举动产生了怀疑。于是我走到那破碗橱前，把妈妈刚才吃着的饭碗拿出来一看，我不禁泪流满脸。这那里是人能吃的饭食呀！里面除了发出酸臭味的烂菜和一些糠皮以外，那有一粒饭呢！我三口两口的吃完了妈妈碗里剩下的连有钱人家的猪狗也不吃的糠菜食，把妈妈刚才给我盛的那碗菜粥糊端起来，送到妈妈手里，一定要她吃下去。妈妈一边推着碗，一边哽咽地说：“孩子，还是你吃吧，这点米要是我们娘俩一起吃，早就没法活下去了。为了你快长大成人，妈豁出命也心甘。”说着，说

着，妈妈泣不成声。

这种日子怎么过下去。妈妈央三托四，把我送到一家铜作坊当小学徒，混一口饭吃。妈妈仍旧帮人家洗衣服，家里少一张吃饭的嘴，日子挤得紧一点过。

“八一三”抗日战争发生以后，虹口一带的商店、工厂大多数关门，有钱人逃往租界。铜作坊也关门了；很少有人找我妈妈洗衣服了；我和妈妈的生活十分困难。由于长期的饥饿和极度的劳累，不久，妈妈就病倒了。妈妈一病倒，家里的生活就更加苦不堪言。不要说给妈妈治病，连吃糠咽菜也顾不上了。有一天，我从外面捡了些烂菜叶子回来准备烧饭，可是当我拿起平日放糠的瓦罐一看，里面连一点糠星星也没有。我难过地走到妈妈身边，这时只见妈妈枕头旁边淌着一滩绿水，妈妈闭着眼，嘴里喃喃地说：“阿毛（我的小名）！我饿……买……买两只……热大饼给我吃……我不会死的……”我看她连病带饿成这个样子，心里象刀子在搅一样疼。我对妈妈说：“我就去买来给你吃。”说着，我就一个箭步冲出了家门，一边跑一边想，这次就是豁出命来也得给妈妈买回吃的，好救救她的命。我一口气跑到了乍浦路桥

附近, 那里有专等人家来雇工的“人市场”。我一边焦急地等待, 一边心想, 不管活有多重、多累、多危险, 只要挣到钱能为妈妈买几只饼, 我就去干…… 过了一会儿, 突然开来了一辆汽车, 从车上跳下几个工头模样的人叫喊着, 说: “有一项工程要开工, 打算雇佣一批人, 工钱大, 又吃得好, 有谁愿意去的跟着走。”一大堆等着找工作的穷人不大相信这伙人的花言巧语, 谁都不吭声, 用怀疑的眼光探望着。我一心想着要救我妈妈的命, 随口就说: “我去。”接着又有一些人相继报了名。我们便被连推带拉地带上了汽车。汽车跑了很长的时间, 一直开到一个又远又偏僻的地方。车子停下来, 我们一群穷人就被当作囚犯一般, 关进一座黑洞洞的房子里, 周围还加上铁丝网, 不许我们走动, 我们失去了自由。我知道上当了, 心中焦急万分, 惦念着妈妈的死活, 几次要求他们放我回家, 可是每次都遭到他们的打骂。到了第二天一早, 我们这批被骗来的穷人, 就被赶上小火轮, 关进腥臭、密不通风的底舱, 颠簸了两天两夜, 才到了一个地方。听一起被骗来的大叔、大伯说, 这里是杭州。我们下船以后, 就被分散关在老百姓住过的空房子里。原来是日本人收买了一批汉奸工头,

到处招雇劳工，装运到杭州背军火。我们不知道底细，就受骗了。我想妈妈，整天只是哭。一起被骗来的穷人大叔、大伯知道我的遭遇之后，都很同情，便凑了几个钱给我作路费，在第三天帮我连夜逃了出来。一起逃出来的还有跟我一样年纪的小孩五六个，后来都失散了。我一路上讨饭吃，忍饥挨饿走了六七天，才回到了上海。到了上海，我用大叔、大伯给的一点钱在街上买了两只热乎乎的大饼，脱下一件破衣服紧紧的裹住，急急忙忙往家里奔去。当我走到家门口时，屋里静悄悄的。我抢前一步，推开门，屋里黑黝黝、空荡荡的。我心想，会不会妈妈病好了，又出门帮人家洗衣服去了呢？我迟疑地走到邻居家里去打听。这才知道，妈妈在我离开家不到三天，就活活的饿死在床上。我双手捧着还冒热气的大饼，木然地站在妈妈生前睡过的破床前，哭干了眼泪，……从此，我成了一个孤儿，怀着对旧社会的仇恨，流浪四方。这时我才十三四岁。

旧上海有许许多多的高楼大厦，一幢幢漂亮的花园洋房，可就是没有穷人栖身的地方。我妈妈死后，没有亲人疼爱我，我也无家可归了。白天，便到乍浦路桥一带和一帮穷孩子一道，等候载有乘客的

三轮车、黄包车过桥，就抢上前去，在车后面推，一直推到桥当中，等乘客给两个钱。就这样推呀，推呀，推着车子拚命地奔跑，脚心磨起一个个血泡，一天下来，勉强混个半饱。晚上，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穷孩子就蜷缩着身子挤在桥墩下过夜。到了寒冬腊月或是下雨下雪的时候，桥墩下寒风刺骨，冷得实在熬不住，我们便到附近的公共厕所里，找个避风的地方过夜。可是那些狼心狗肺的伪警察，不但对我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反而说我们妨碍卫生，经常到厕所里撵我们，不让我们在厕所里过夜。为了能够活下去，我们这些流浪儿便团结起来，大家轮流守夜，狗警察一来，大家就跳起来躲在暗处请他吃“石子”。这样，在那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旧上海，我们才总算有一个可以蹲一蹲避避风雨的一席之地。可是我们这些穷人的孩子，大多数都是腹中无食，身上无衣，在那滴水成冰的严寒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头晚躺下去、第二天早上再也叫不醒的小兄弟。我们在送走这些冻死的小兄弟的时候，虽然都知道这种命运明天也可能落到自己的头上，可是我们却没有眼泪，我们只有对那罪恶人间的满腔仇恨。

有一天，我听说乍浦路桥附近的“人市场”又在



招工。我心想，不管怎样，当雇工总比在桥头推车喝西北风强吧！谁知道一只脚刚拔出苦海，另一只脚又踏进了火坑。

招工的地方排着长长的队伍，尽是穿着破破烂烂的一些穷苦人，在那里挤来拥去希望找到工作。招工头站在桌子上讲得天花乱坠：“做一天工领五元大钞（伪币），吃三顿白米饭……”一个日本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恶狠狠地在维持秩序，队伍乱一点，棍子就落在穷人们的身上、头上。我好容易挤进了人群，走进一个小房间，踮起脚看着人家是怎样报名的。那个拿棍子的日本人从背后冷不防的踢了我一脚，试试我的力气，我差点跌倒。日本人哈哈大笑，嘴里叽哩咕噜的不知讲些什么，招工头就让我报上了名。第二天，我和其他的穷人被装上汽车，朝江湾的方向开去。在一个用铁丝网包围起来的工棚里过了一夜，一大早就被赶进一大片荒滩上干活。原来是日本人收买汉奸工头诱骗中国劳工造飞机场。我又一次受骗了。

当苦劳工真不好受呀！天不亮，工头拿着棍子把我们赶出工棚，大家饿着肚子上工地修跑道，挖土开河，扛水泥筑碉堡，……干的尽是重活累活，一天又

只吃两顿饭，到手只有五角(伪币)工钱。招工头原先讲的“优厚待遇”都是骗人鬼话。大家实在不愿意给日本人筑飞机场，趁日本监工不在的时候就磨洋工，监工来了，表面上才做得起劲。结果，工程进展不快，日本监工就打人骂人，用种种野蛮的办法来折磨劳工。有时候，我们正在拉石滚碾跑道，或是背水泥爬坡，突然间日本监工喊集合，嘴里叽哩咕噜的走近劳工站的队伍，伸手就“啪啪”打人。有时候，晚上我们又饿又乏的躺在工棚里，忽然监工嗥叫一阵把大家赶出工棚站队，借口丢失东西要搜查，让大家在外面冻得哆哆嗦嗦。那些狗东西就是这样惨无人道。他们以为这样折磨人，就能使中国劳工屈服，为他们卖命。后来我们不只是磨洋工拖慢工程速度，遇到背水泥或是扛一捆捆电线进工地的时候，趁工头不注意，就扔进壕沟里，然后用烂泥埋起来，破坏敌人的物资，发泄心里的仇恨。江湾飞机场造好了，我进去时穿一身破单衣，出来时破单衣磨成了碎条条，到手的工钱补贴吃饭还不够，结果仍然两手空空。

造好了江湾机场，可恶的日本监工还不许我们回家，又把我们装上船运到舟山造飞机场。这次坐的是日本轮船，他们怕中国劳工半路逃走，都被关进又

暗又拥挤的底舱，每天开两次门“放风”吃饭。我们象囚犯一样，出来活动时工头在旁监视，不许东张西望，连看一眼自己祖国的江山也没有自由。一连三四年，我就在江湾、舟山（有一个时期还在杭州机场呆过）几个地方流浪做苦工，最后从舟山机场逃出来。

在舟山，劳工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空着肚子修跑道，挖机场四周的壕沟，一直到十点钟才能吃上一顿饭。一天吃两顿饭，干的尽是牛马活。当时我年小体弱，干了几天活就累得口吐鲜血。一天，我背着一袋水泥，经过一条壕沟，走在独木桥上，两腿直发抖，一脚踏空，连人带水泥掉在沟里。工头赶来，不仅不救人反而说我故意糟蹋水泥，举起鞭子就对我劈头盖脸地打来。我当时正从水里站起身来，半截身子还泡在水中，身上寒冷，腹中饥饿，旧伤又发，脸上又被打得鲜血直流热辣辣的，真是怒火万丈，便大吼一声：“我跟你拚啦！”抓起一把湿水泥向他头上打去，一下子正好打在他的脸上。这个外强中干的汉奸工头，便象一只受伤的野狗一样嚎叫着，一边擦眼睛，一边捂着脸，急忙的逃走了。工头逃啦，后面跟上来的几个劳工都气愤地把肩上的一袋袋水泥泼在



地上，下壕沟扶我上岸，又领我回工棚换衣服，包扎伤口，然后找来两根枯树干，大家一起抬到我跌跤的地方去搭桥。这时，只见逃走了的工头正领着日本监工在那儿指手划脚，一见到我，他就象一条疯狗恶狠狠地向我

冲来。他刚要抓住我，便被我身旁的一个劳工把他拦住，愤怒地向他责问：“你桥不搭，人不救，反而行凶，是什么道理？”这个家伙看见身旁有日本监工撑腰，便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把水泥泼在地上，有意怠工，你们反对‘皇军’……”这时后面又陆续来了

一些背水泥的劳工。有一个劳工冷不防把一包水泥往工头的肩上一搁，说：“你把这包水泥从独木桥上背过去，试试看好不好走。我们的人跌伤了，你还无理打人！”一包水泥压得工头哇哇叫，身架骨也弯了。他摔掉水泥包子，暴跳如雷，举起鞭子正要打人；但是，在场的劳工们攥得紧紧的一双双拳头吓得他傻了眼，连忙缩到日本人的背后去。日本监工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只是气急败坏地吆喝几声骂几句就跑了。

到了冬天，海岛上天寒地冻。大小工头穿着皮袄，坐在火炉旁烤火喝酒还嫌冷，可我们劳工却穿着破烂的单衣，顶着刺骨的寒风在露天里干活，冷得难受。一天，我在废料堆里捡来一截电线，扎在腰上，免得身上灌进冷风，身体也暖和一些。日本监工看见我腰里扎着一根电线，就诬赖我偷东西，不容我分辩，举起手里的棍子朝我身上乱打一顿。我气极了，就一把夺下棍子，向他头上扔过去，一下子正好打中他的眼睛，他两手捂着脸嗷嗷地叫着跑了。这下可闯祸了，日本人是不会罢休的。一起干活的大叔、大伯赶快凑了几个钱，帮我出主意逃出机场的工地。以后的事情，我就不晓得了。离开工地，我又到处流浪帮人家做短

工过日子。我在上海、杭州、舟山几个机场的工地奔波了几年，工头的皮鞭、苦累的笨重活，折磨得我皮包骨头，我逃回上海时，仍旧是衣衫褴褛，无家可归。对那罪恶的世道，我心底里的愤恨实在难消！

从舟山逃回上海之后，我遇到了一个过去在桥头推车时认识的三轮车工人。这时他身体有病，就叫我跟他合伙踏三轮车，每人踏半天。我从下午踏到晚上，累得精疲力尽，就蜷缩在车厢的斗篷下过夜。饿得踏不动，就向乘客商量，预先要点车钱，买几只大饼充饥。踏车的生活，简直象两只脚的“马”，不停地到处奔跑，而又难得温饱。又何止这样呢！那时的旧上海被帝国主义所侵占和瓜分，分割成英、



美、法等国的租界。我们踏三轮车的载客进入租界，就得买“牌照”；从这个租界进入另一个租界，要换另一种“牌照”；一个租界用一种“牌照”，踏三轮车的工人，要买几个“牌照”。我们拚死拚活踏车子还糊不了口，那有多余的钱买几个“牌照”呢？没有“牌照”，如果不当心超越租界，那批如狼似虎的巡捕警察就上来一顿拳打脚踢，或是敲诈勒索几个钱。为着踏车子走路，不知受了多少外国人的气，遭到巡捕警察的种种欺侮。那时候我常想，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连走路也这样不自由呢？这到底是什么世道啊？我憋着气熬了两年左右，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风餐露宿、挨饿受气的屈辱生活，便在一九四六年，由熟人介绍到唐山号轮船上当杂役，也就是所谓做“西崽”。在黑暗的旧社会，穷人走到那里都是受压迫受欺侮的，在船上当杂役，那儿有脏活重活就得到那儿去干，从早到晚，手脚不停，连气都喘不过来。而生活条件却极端恶劣，吃的是黑心老板和他的一伙人吃剩的残羹馊饭，睡的是桌子底下和走廊边上，……上了轮船，我就象被一条无形的锁链捆绑着，艰难地漂泊在江海上，一直到解放。

在旧社会,我从十三四岁就开始到处流浪,尝尽人间的辛酸。上海解放了,我才和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一样,砸碎了身上的枷锁,跳出了苦海。长期的流浪生活,摧残得我浑身是伤,留下了暗疾,不幸在一九六五年患了癌症,生命受到威胁,后来经党组织和医院全力抢救医治,才使我脱险。想想旧社会我母亲劳累一生,最后又病又饿、奄奄一息,要吃两只大饼救救命也做不到,活活饿死,穷人的性命真不如草。我这个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流浪儿、苦船工,如今在党的培养下,站在轮船的驾驶台,掌握着舵轮,航行在长江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搞好运输而奔忙,过去被看不起的工人,现在成了国家的主人。世界真是整个儿地翻了身,我在睡梦中也会笑出声来,象小旅客坐船旅行一样,处处感到快乐幸福。

轮船在汽笛“呜呜呜”的鸣叫声中进入黄浦江,甲板上的孩子们又欢腾起来了,大家忙着整理行装,又要和等在码头上迎接他们的亲人见面了。目送着小旅客下船,面对着他们和亲人见面时欢乐的情景,我这个“讲解员”不由得也暂时中断了对旧社会苦难生活的回忆,而被吸引到眼前码头上动人的景象中去。在小旅客挥手向我们船员告别时,我心里又在羡慕



他们童年的幸福。为了不让吃人的旧社会的种种罪恶重新出现,为了迎来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我要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更好地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长江航运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工李师傅口述

冯解放整理

黄大华插图

## 我跟爸爸推粪车

每天，天上的星星还在忽闪忽闪的时候，我们推粪车的清洁工人就在马路上、弄堂里走千家跑万户的倒马桶，为搞好城市环境卫生到处奔忙。我们走过每个地方，一张张笑脸相迎，问寒问暖，里弄中的劳动大姐、老妈妈、小姑娘个个热情相待：“辛苦了，老师傅！”“师傅，喝杯开水暖和暖和！”“师傅，喝碗凉茶歇一歇！”在新社会，我一年四季推着粪车走街串巷，听到这些热乎的话，常常激动得眼里闪出泪花。我在旧社会推了十几年的粪车，粪霸头的残酷剥削不待说，那些老爷、太太从粪车旁边经过，不是捂着鼻子，就是骂一声“臭瘪三”；车子进弄堂，经常要遭到地痞流氓的辱骂和嘲弄；推粪车过马路稍不留神，伪警察的棍子就“啪啪”地打过来……在万恶的旧社会，推粪车工人被人瞧不起，又过着种种非人的生活。

在新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变了，每一样平凡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我推着粪车走大街、穿小巷，想到一人辛苦万户干净，心里就亮堂了，做好这项平凡的工作，我感到光荣，意义重大。但是，我们推粪车工人在旧社会的苦和仇，在新社会的幸福感受，对那些生长在红旗下的青年来说，他们是不懂的，体会也不深。管理站的党支部号召带徒弟推粪车的老工人，要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和阶级教育，让他们痛恨剥削制度，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运动，在劳动和斗争中培养接班人。我和我的徒弟小张推着粪车，走过我当年洒过血汗、受过欺压的地方，就讲讲我童年的苦难遭遇，进行回忆对比。

.....

我十岁那年，老家苏北遭到一场大水灾，几亩薄田和两间草房都淹了，一点吃的也没有。爹妈整天发愁，有一次听人家说，上海是个大地方，容易混口饭吃，就带着我和五岁的妹妹，逃荒来到了上海。

那时候的上海，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是劳动人民的人间地狱。我们到了上海，只得流落街头，露宿在马路边上。后来总算找到了闸北蕃瓜弄安了家。

那时的蕃瓜弄跟今天大不一样，都是茅草棚和“滚地龙”。弄堂里又尽是坑坑洼洼，下雨天水流不出去，便成了一个一个的污水塘。大的污水塘有半人多深，还淹死过小孩子呢。到了夏天，苍蝇蚊子就不用说了，成群结队的乱叮人。我们家就在那个污水塘边上用几张芦席搭了个“滚地龙”。在那里总算能勉强安身。找到地方住下来了，但还得吃呢。

旧社会要想找个活儿干真不容易啊！现在，你们中学毕业了由国家分配好工作，带着通知单就来报到上班。那时候要央三托四找门路。我爹托人介绍，在闸北一个粪霸头绰号叫做“刮油膏”的人那里做雇工。“刮油膏”的本来名字叫郭玉高。这家伙是个地痞流氓，剥削手段毒辣，别的不说，单说他每部粪车向居民收来的倒马桶费，每月就能进账四五担米，加上肥料卖给农村，收入就更多了。而我们工人，每天三更半夜出来倒马桶推粪车，到第二天中午才收工，终年累月风里来雨里去，累死累活的干，一个月才拿到三斗米的工钱。车子坏了，还要工人自己花钱修理。每逢过年过节，不管工人有没有米下锅，也得给他送礼。否则的话，就要收回粪车，敲掉你的饭碗。你说，这家伙狠毒吗？所以工人们给他起了

这个绰号。

三斗米（约共四十七市斤）怎么能养活一家人呢！那时物价飞涨，等月底拿到工钱，还买不到二斗米哩。为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我爹每天放下粪车又去拉黄包车，多赚两个钱补贴家用。我和妈去拾垃圾，倒泔脚，白天家里只留妹妹一个人。倒也干脆，用不着锁门。因为穿的都在身上，全部家当只一条破被和一只破锅、几只破碗，送给人家也不要。不过，妹妹在家没有人照顾。

那时的粪车跟今天的大不一样。今天我们推的是橡皮轮子，而且还有三轮卡车和大卡车搞运输，大大地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那时的粪车是铁轮盘的，又笨又重。马路也不象今天那样宽阔平坦，特别是闸北一带的马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铁轮盘陷进了泥洼地怎么也推不动。所以我还得帮爹推粪车，用根绳子背在肩上在前面拉，有时在后面推。象我这样从小帮爹妈推粪车的孩子在那时还不少呢。

现在，国家发给清洁工人工作服、雨衣、胶鞋、口罩、手套，下雨淋不着，冷天冻不着。在旧社会谁来过问，粪霸头只想从工人身上搜刮血汗，死活不管。遇到下雨天，一身破衣服从外湿到里，连替换的也没

有。有时在马路旁拾到一只破蒲包，剪个洞，往身上一套，挡挡雨。到了寒冬腊月更是难熬，半夜三更出去倒马桶，身上只穿件破棉袄，西北风象刀子一样直往身上扎，冻得人一路走一路打颤。我的一双小手经常冻得有馒头那样高，脚上连双破鞋也没有，赤脚穿草鞋跑大街小巷，脚后跟裂开了口，碰到草鞋就象针刺的那样痛，鲜血直淌。妈只能找来几块破布，把我的脚包上。她跟爹说：“让孩子歇一天吧！”

“不，天下雪，路上滑，车子不好推。再说，过了时间就糟了。还是让我帮爹添把劲好快一点。”

那时国民党反动政府规定，过了上午十一点钟，粪车在市区就不准通行，说什么有碍“市容”。违反规定就要罚



款，还要遭到伪警察打骂。我还没等爹说话，咬了咬牙穿上草鞋，故意地走了几步给妈看看。

“妈，包了布，不痛啦。”妈何尝不知道我是忍着痛呢，可也没有办法。我和爹一年到头就这样在凄风苦雨中到处奔波，但所得到的还不够一家人吃个饱饭。爹常常愤愤不平地说：做牛马还能吃饱草料，我们穷人干的牛马活，还顾不了肚皮，这个世道什么时候才了结。

一天，我们推着粪车路过“新衙门”（现在的浙江北路七浦路路口），解放前这里是国民党的伪法院。天刚下过雪，路面很滑，车轮陷在雪槽里，推起来非常吃力。就在这时，衙门里跑出来两个伪警察，恶狠狠地赶我们。

“臭瘪三，快点推走！”

“路太滑，车子难推啊。”我爹说。

“他妈的，还顶嘴！”说着朝我爹背上就是一棍子。另一个伪警察跑过来，说声“快滚”，又猛地推了我爹一把。我爹身子朝前一冲，一头栽倒在粪车上。车子摇摇晃晃，车把子一偏，一只轮盘滑进了电车轨道，粪便溅了一地。两个伪警察象鬼叫狼嚎般地骂开来：“瘪三，混蛋！”又用棍子朝我爹身上打过来。我

看到这个情景，胸中怒火直冒，急忙冲上前去，用头猛力地朝一个伪警察撞去，那个家伙吓了一跳，趑趄了几步，差点摔倒。另一个伪警察朝我背后打来，我爹看到伪警察这样蛮横行凶，气得用尽全身力气大喝一声：“住手！”两个伪警察象饿狼一般扑向我爹，拳打脚踢。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群中站出一个工人模样的大叔，责问伪警察：“他犯了什么法，你们这样打人？”

“此地是法院门口，把粪便溅在地上，阻碍交通，有损法院的尊严，就是违章犯法。”拿棍子的那个伪警察气势汹汹地说。

“明明是你们动手打人，又弄颠了车子，溅出了粪便，反说人家违章犯法。你们这是什么法？”工人大叔用手指着伪警察评理。

“他妈的，你看见的？”伪警察放开喉咙朝着工人大叔叫骂。

“我们都看见的。”众人闹哄起来。伪警察见势不妙，才转身溜进岗亭里去。

亏得这些穷人大叔帮我们爷俩的忙，不然的话，我们一定遭到毒打。那时候恶人当道，你到哪里去跟他们评理，法院就是专门欺压穷人的嘛！



那位大叔叫我扶着爹，他帮我们推着粪车，一直送到家里。

粪霸头知道了我们推车溅了粪，找上门来对我爹嚎叫了一阵，说是要赔偿他的损失，到月底拿工钱时，硬扣下半斗米的钱。这个坏家伙就是这样在我们穷人身上打主意，随时想吸一口血。

我爹在粪霸头的剥削下，在痛苦生活的煎熬下，压驼了背，累弯了腰，觉得在旧上海很难混下去，想念回苏北老家。回苏北老家，又何尝有活路呢！

再说那个粪霸头，他榨取了我们清洁工人的大量血汗，养肥了他自己，从两部粪车雇工起家，后来发展到成为有十几部粪车、几条粪船的粪包商。他见我爹身体多病，再也榨不出油水来，便借口要收回粪车，另外雇人。那时的上海滩，穷人找别的事做也不容易啊。经过我妈再三商量，他才答应由我来顶替爹推车，不过工钱要压低到一个月二斗半米。狠心的粪霸头就是这样贪得无厌。

我开始顶替爹去推粪车那年，才十四岁，人比车子稍高一点，推着车还看不见前面的路。我害怕粪车撞着人闯祸，经常提心吊胆的踮起脚尖走路。有时我在前面拉车，我爹在后面推一把。因为生活的

折磨，他衰老多了，连跟车赶路还感到气喘吁吁呢。所以，遇到上坡过桥时，我用足力气也推不动，过路的工人大叔见我人小就来帮我一把。

在闸北一带坎坷不平的路上推呀，推呀，繁重的劳动，折磨得我骨瘦如柴。妈每天等在门口，见到我推粪车回来，就紧紧地抱住我，总是心疼地说：“孩子，又累坏啦！这日子真没法子熬呀！”为了不让妈心里难过，我总是强装着笑容说不累。其实，我每天两只手捏着车把子出门的时候，常常是泪水含在眼眶里，又只好咬着牙上路。痛苦生活的煎熬，伪警察的打骂，粪霸头的剥削，流氓的欺侮，在我心头上烙下了仇恨。

一天，粪霸头叫人通知我到开封路倒马桶。这里住着一个姓钱的大财主，他家有三只马桶，仗着他的恶势力，要推粪车的人上门去拎。我头一天去不知道有这个“规矩”。开头一声喊，不见有人出来倒马桶，却从黑铁门里窜出一个管家奴才，不由分说的打了我一拳。“你为什么打人？”我不服气的责问。“打人？一大早就叫唤，吵醒了老爷还要送你进班房。”说罢把腰一扭，瞪起水泡眼朝我上下打量，说：

“我家里的三只马桶为什么不来拎？”

“我喊过了，没有人拎出来嘛。”

“臭瘪三，你倒马桶的不来拎，谁拎？”又气势汹汹地说：“老子给你立个规矩，每天到楼上来拎。”我憋着一肚子气，推着粪车走出开封路。路上，我碰到一些推粪车的大叔，就一五一十的讲了刚才受欺侮的事。他们对那个管家奴才的横蛮无理都十分气愤，帮我出了主意对付他。以后，我推粪车进入这条路，故意不喊也不叫，劳动人民放在门口的马桶我倒完了推车就走。结果，姓钱的大院里几天没有倒马桶，臭气熏天。到第三天，那个管家奴才急了，半夜里就守候在黑铁门旁边，等我推着粪车走过，怒气冲冲地追上来要打我。我使劲地推着粪车，让粪水四溅，这时，平日跟我爹要好的刘大叔正推着粪车从弄堂口出来，看到有人在追打我，就故意把粪车往那管家奴才面前一放。看到刘大叔，我胆子也壮了，就责问那管家奴才为什么要打人。他翻着水泡眼狠狠地嚷着：

“你断了腿怎么的，为什么几天不来拎马桶？”

“我们推粪车的管倒不管拎。”刘大叔理直气壮地帮我说话。

“谁给你立的规矩？”



“邻近左右倒马桶都是这个规矩。”

那个管家奴才看看用恶势力压我们，一时不能得逞，再说，大热天不倒马桶，真要臭煞人了，才不得不半商量半威胁地说：“以后经过大院门口要喊喊，你断了舌头怎么的？”他还扬着拳头，叫嚷以后要揍我。我不理不睬，和刘大叔推着粪车，一前一后地走出开封路，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

一天，粪霸头把我叫得去，对我暴跳如雷，说是我得罪了姓钱的大财主，害得他送礼赔罪才算了事，扬言要在我的工钱里扣除送礼费一斗米。他的气出在我们工人头上。我一个月的工钱在粪霸头手里七

除八扣，剩下只有一斗半米，一家四口人怎么过活？但是，饿瘪肚皮我也不去顺从那些老爷们。

在黑暗的旧社会，我们推粪车工人不但受粪霸头这些坏家伙的剥削和辱骂，还要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欺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上海之后，日本兵在桥头这些交通要道站岗，规定中国人经过他们的面前要弯腰行礼。我们推车的爬坡上桥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也得照样行礼；不合那些日本兵的心意时，就蛮不讲理地一枪托砸过来。更无理的是车子过桥超过规定时间也要挨打。唉，那时候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连走路也没有自由！有一次就发生了这样惨痛的事。

一天，粪霸头的雇工老孙头推着粪车要过新垃圾桥（现在的西藏路桥）的粪码头去卸粪。老孙头是个五十多岁的人，平时挨饿受冻，瘦得皮包骨头，推一车粪爬坡上桥有多少吃重，我们年轻人也要累得喘大气，不要说老孙头。他紧推慢赶到桥上，日本兵借口已经超过十一点钟，不许通行。凶恶的日本兵举着枪托赶打着他往回走，他一让，连人带车，从桥上翻下河浜，被水淹得头昏肚胀，不省人事，幸亏过路的行人把他捞上岸来。粪霸头知道了，跑来一看，不

是问老孙头怎么样了，跌伤了没有，而是先问车子跌坏了没有，还责怪他浪费了一车粪水。过路的行人看到粪老板这样刻毒的对待老孙头，气愤不过，纷纷责骂这个黑心狼。后来粪老板被迫才装模作样的雇了黄包车送老孙头回家。那时，一车粪水只值伪币五角钱，我们穷人的一条命还不如一车粪水值钱。

我们这些从小就跟着爹妈一起干活，后来又顶替爹妈推粪车的清洁工人，讲起过去血泪斑斑的苦难生活，无不仇恨满胸膛；看到解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心中真是激动万分，感到无比的幸福啊！“共产党毛主席恩比天高！”《海港》中马洪亮老师傅唱出了码头工人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也是同样唱出了我们清洁工人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深情！

喜见新的一代在成长。我的徒弟每次听我讲起旧社会的罪恶和我自己的遭遇时，就往往激起他对过去的无比愤恨，他坚定地说：“师傅，旧社会在你身上留下的伤痕，提醒我要不忘阶级苦，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我们决不能答应！同时，也加强了我对清洁工作的热爱，我决心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人民推一辈子粪车。”听到这些激动人心的话，我们做师傅的怎么能不喜爱这样有出息的徒弟呢！

党的阳光雨露正在哺育着他们一天天成长，他们一定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上海市闸北区清洁管理站工人李师傅口述  
站政宣组整理  
夏子冰插图

## 踏进纱厂第一“关”

我的二女儿玲玲今年中学毕业了，事情说来也凑巧，她被分配在国棉六厂工作，我们母女俩正好同在一个厂。我的孩子早就有想当一个纺织工人的愿望，以她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要站在隆隆的机器前，用自己的双手纺成的纱、织出的布，运往全国各地，运往全世界，支援祖国的建设和世界革命。现在，她的愿望得以实现了。不料她第一天上班回家，我就发现她手里拿着一件簇新的工作服——饭单坐在椅子上发愣。看到孩子沮丧的神情，我便关心地问：“玲玲，怎么的，你中学刚毕业，党就给你安排了工作，第一天上班，应该感到高兴……”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她忽的抬起头来，说：“妈，我想当纺织工人的理想完了。”说着，举起她手里捏着的那件簇新的饭单：“你看，真倒霉，把我分配在食堂里工作！”在新社会，青年人能这样无忧无虑地走上工作岗位，是多么





幸福呀！但是孩子还感到不满足。这是由于孩子在红旗下长大，对旧社会劳动人民受尽压迫，为了找工作而到处奔波的痛苦缺乏了解，不善于把新社会和旧社会进行比较，所以，一时在分配上不符合愿望，就认为“倒霉”。一定要给她补

上这一课。于是，我打开衣箱，寻出一件已经泛黄、破旧但“019”的工号还模糊可辨的饭单给我女儿看。这是我考厂“录取”之后，进车间做工发的一件“工作服”，它伴随我经历了多少个痛苦的岁月，是我在纱厂受尽剥削和折磨的见证物。为了能领到这件饭单，保住这件饭单，当一名养成工，我是历尽了多么艰辛，流下了多少血汗啊！

现在的上棉六厂，它的前身是国民党官僚资产

阶级办的中纺六厂。我是一九四五年进中纺六厂当养成工的。算起来，前前后后，我在这个厂已经干了将近三十年了。那时候，官僚资产阶级为了搜刮劳动人民更多的血汗，就大量招雇廉价的劳动力，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在棉纺织业，他们耍弄手法，大量招收养成工。所谓养成工，用资本家的话来说，就是培养“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的现代工人”。因而，培养的对象必须是“有文化、体格强健、手脑灵活、五官端正”的十四到十七岁的未婚姑娘。但是，甜言蜜语掩盖不住资本家的蛇蝎心肠，说穿了，养成工不过是“包身工”的别名而已。从包身工的卖身做工到养成工的“文明考试”进厂，只是换了换汤，资本家手里的毒药没有变，他们不过是以更阴险、更凶残的手段，从那些年轻力壮的养成工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养肥自己。

可是，在豺狼当道、虎豹横行的旧中国，农村破产、城市凋敝，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多少苦难的姐妹在死亡线上挣扎。所以，当中纺六厂招收养成工的布告一贴出来，一群群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穷苦姑娘，连夜就蜂拥到中纺六厂大门旁的铁丝网前去等候“考试”，希望能找到工作，吃上

一口饭。天刚蒙蒙亮，应考的已有千余人，然而，人还是络绎不绝地朝厂门口涌去。当时，我才十四岁，是一个刚从资本家家里逃出来的小丫头，就挤在这人群中找生路。我已经是第三次等在这里应考了。前两次，招工头不是嫌我个子矮小就是嫌人太瘦，不够分量。原来考厂要过九道关，第一关就是测身高、称体重。身高不到四尺六寸的不要，体重没有七十市斤的也不要，结果，我过不了第一道关。后来，一个穷苦的姐妹悄悄的教我办法：事先拣两块烂铁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拾些破布垫在鞋子里，这样不至于第一关就通不过。我是多么盼望能考进纱厂当个工人，结束那凄苦的流浪生活啊！但是眼看着面前如潮水般涌来的人群，一张张蜡黄、焦急的面孔，我的心不住地往下沉。这一次来应考的人似乎比前两次更多，可是资本家出的布告上明明写着只招收四十名。

太阳已升起老高了，厂里还没有什么动静，大家焦急地等待着。一个通宵站下来，两条腿都麻木了，又饿又累，人都快瘫下来。

十点钟光景，人群骚动起来，我连忙掂起脚尖抬头望去，只见厂里一幢楼房里涌出一群人来。走在

前面的是一个穿着西装皮鞋、手拿文明棍的胖子。那胖子秃着脑袋，挺着便便大腹，慢慢吞吞地向铁丝网前摇摆过来。他就是中纺六厂的伪厂长，外号叫“老和尚”的。这个家伙表面显得和善仁慈，骨子里却凶残毒辣。上头的主子对他这个奴才十分赏识，而工人们对他却恨之入骨。满脸横肉的招工头和几个挎着盒子枪的巡警尾随着“老和尚”走到铁丝网前。“老和尚”眯着一双狡猾的贼眼，向挤在铁丝网外的小姑娘们溜了一阵，就象挑选商品似的在人群中扒拉着，一个一个挑来挑去，看中了的就用文明棍指点一下，哈叭狗般的招工头马上就把一张写有号码的白纸发给点中的人。小姑娘们只有拿到这张纸，才能从低矮的边门进去应考。“老和尚”大概是站累了吧，他忽然扬了扬文明棍，向招工头交代了几句什么，就钻进了大楼。招工头手中的纸只剩下几张了，我心里急得火烧火燎，要是拿不到号头纸，又不知要等多长时间呢！忽然见招工头向我站的方向走来了，我拚命向前挤着，并悄悄地掂起了脚尖。招工头的贼眼在我身上扫了几下，终于顺手递了一张号头纸给我。拿到号头纸，不由得我满肚子的苦水涌上心头：为了这张号头纸，有多少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露

宿在厂门口；又有多少个大暑天顶着烈日在铁丝网前等候。进厂当牛马还如此困难，这万恶的旧社会哪里有穷人走的活路？

考厂要过九道关，一道更比一道难。老板、招工头选中了，才肯发给应考的人一张号头纸。拿到号头纸还要我们自己在上面填写姓名、年龄、籍贯和地址。我拿起好象有千斤重的笔，喘着粗气，歪歪扭扭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年龄、籍贯等。看着被汗水渍湿了的表格，我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要知道，学会写这几个字，对我来说可真是不容易呀，这一笔一划凝聚着多少辛酸和痛苦！……

我出生在云南省一个穷苦的工人家庭，在三座大山的压榨下，我们穷孩子连饭也吃不饱，根本就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可是万恶的旧社会给我带来的是更悲惨的命运：我三岁那年，妈妈就得病死去。九岁那年，爷爷又被资本家吸干了最后一滴血，含恨去世。奶奶又气又恨，不久也在贫病交迫中死了。在饭馆打杂的父亲连自己也得勒紧裤带过活，那里养得活两个孩子？就狠下心把我哥哥送到铁铺当学徒，又把我卖给重庆来的一个资本家当小丫头。万恶的旧社会弄得我家破人亡！在资本家的虎狼窝

里，五年的丫头生活，折磨得我皮包骨头、遍体鳞伤；五年的丫头生活也磨炼了我倔强的性格、反抗的精神。抗战胜利后，资本家的一家搬到了上海，我也被一起带走。我再也忍受不了越压越重的牛马活、越打越狠的皮鞭棍棒，毅然地逃出了这吃人的虎狼窝，流落街头。从此，我便开始过着艰难凄苦的流浪生活。旧上海是穷人的一座活地狱，对于我这样一个人生地疏、语言不通的乡下小姑娘来说，更是随时有冻死、饿死的危险。正当我在死亡线上绝望挣扎的时刻，是一位穷苦的三轮车工人向我伸出了救助的手，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能够第三次又来考厂。为了闯过要在号头纸上写姓名、籍贯这一关，我不知流了多少汗，熬过多少夜晚，我请求在马路上摆测字摊的老先生在一张纸上写下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和地址，以后我就不分日夜的照着写啊、画啊，甚至在梦中，两只枯瘦的小手还在使劲地比划着……

在招工头的吆喝声中，我和其他小姑娘们拿着填写好的号头纸，排着队，等着去过第一道关。“快，快排排整齐。听见没有？”招工头突然气急败坏地叫嚷起来。一个小姑娘稍迟了一步，就被他狠狠地拎起了耳朵，痛得尖叫起来。人群中不知谁低声嚷了

一句：“胖子又来了。”我这才看到，“老和尚”果然摇摆着臃肿的身体，拄着文明棍又临场“监考”来了。只见他对招工头说了几句什么，招工头点头哈腰连连称“是”。“老和尚”转过身来对着人群，又眯着他那双贼眼在小姑娘身上溜来溜去。忽然他的眼珠不动了，阴森的目光停留在一个穿一身土布大襟短衫、大脚管裤的姑娘身上。那姑娘看上去年龄仿佛比我们大些，一张圆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当她皱起眉头吃惊地瞅“老和尚”时，额头上刻有几条浅浅的纹路。看样子也是从乡下逃荒到上海的穷苦姐妹。招工头一看主子的眼色，便耀武扬威地走了过来，二话没说就夺走姑娘手中的号头纸，送到“老和尚”面前。“老和尚”瞟了一眼，冷冷地说：“嗯，已经十九了。”说着把手一挥，狐假虎威的招工头不容分辩就把这个从乡下来的穷苦姑娘推了出去。“你们怎么这样不讲道理啊！”厂门口传来了姑娘又急又忿的哭喊声。我心中感到一阵火辣辣的难受，愤懑不平的泪花在眼中翻滚。在旧社会，进厂做奴隶挣口饭吃就这么不容易！“你们看到没有？”招工头气势汹汹地嚷着：“谁要是隐瞒年龄，或者结过婚的，查出来对她不客气！”

“老和尚”的眼珠又乱转，贼眼溜溜的瞅这瞅那。小姑娘们提心吊胆，十分紧张，不知这次又该轮到谁遭殃呢！阴森的眼光忽然停在我的身上不动了。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难道又要嫌我矮小赶我出去？难道进厂的希望又要破灭？想到当丫头的悲惨日子，想到痛苦的流浪生活，仇恨在胸中翻腾。当我看到招工头正走过来想夺走我手中的号头纸，一股怒火从胸中燃起，“不给！”我愤怒地叫了一声，手里紧紧地捏着号头纸，





猛力一跳，躲过招工头的魔爪，心急气愤地嚷着：“为什么抢我的号头纸！我要做工！我不回家呀！……”不知是“老和尚”被我这反抗的举动一时吓懵了呢，还是刚才这敏捷的动作引起了他的兴趣，使他感到我身上还有油水可榨取？“老和尚”突然发了“善心”，他摆了摆手，假惺惺地对张牙舞爪的招工头说：“饶她这一回吧，我魏某给她一碗饭吃！”正被我的反抗精神所激怒的招工头听到“老和尚”这两句话，不由楞了一楞，但这种人惯会看风使舵，一会儿他就哈着腰恭维道：“是呀，我们厂长真是菩萨心肠，这样又矮又瘦的小姑娘还要收留她。”他一扭头恶狠狠地对大家说：“你们考取了都要卖力干活，报答我们厂长的大恩大惠！”“老和尚”眯着贼眼微微点了点头，便扭转身钻进了大楼。看着“老和尚”臃肿笨拙的身体和满脸伪善的丑态，我的拳头握得“格格”响，真恨不得走上前去把这胖老板砸个稀巴烂，心里才解气。

靠着衣兜里的烂铁，鞋子里的破布，瞒过了招工头的贼眼，我总算闯过了第一道关。我拿着号头纸等待着去过体格检查关。过了一关又一关，考个养成工真比登天还要难。

这一关名义上是检查有无传染病，而实际上只

要在你身上发现一块烂疤，就要借口你有传染病而被除名。因此小姐妹们都称它为“要命关”。

检查的时候，一个戴白口罩、穿白衣服的女人指手划脚地叫小姑娘自己解开衣衫检查。那女人嫌我们脏，一般情况是不肯轻易动手的。这时，排在我前面的有一个叫顾月琴的小姑娘被叫到检查的椅子前，那女人看她衣服破旧，又嫌她身上气味难闻，还未走到跟前，就皱紧眉头不耐烦地说：“站远一点，解开衣服！”当那女人看到小顾身上斑斑点点一大片的时候，就拿起笔，把她的名字除掉了。小顾一看急得直嚷：“医生，你看看清楚，我没有生癞疥疮，这都是蚊子臭虫咬的呀！你看看清楚……”可是不容分说，小顾就被推了出去。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劳动人民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住的是“滚地龙”，那一个穷苦姐妹的身上不是条条鞭痕，处处伤疤！想到这儿，我不由得又摸了摸自己腿上被老板娘用香炉砸伤的疤痕，它是我悲惨的丫头生活的见证。眼下如何才能遮掩过去呢，我心里焦急着。轮到检查我的时候，刚好吃饭的时间到了。那女人急着要去吃饭，就匆匆看了看我的手脚，伤疤正好被撩裤腿的手遮住了，没有被发现。我终于又闯过了这一关。……

资本家设置的考厂关，就是为了尽量挑拣一些年轻力壮、手脚灵活的小姑娘来当养成工，用这些比成年工人更为廉价的劳动力来替代已经被榨干了血汗的病弱的老工人，使他们能够剥削更多的钱财养肥自己。

经过了多少的艰难和折磨，我侥幸地被“录取”了。但后面还有过不完的难关：“贴子关”、“送礼关”……。大大小小的老板、工头，什么“儿子满月”、“老子做寿”，连死了不知多少年的祖宗八代也要请出来做“阴寿”。贴子一发，就得送礼、送钱。有多少穷姐妹因没钱送礼被借故踢出厂门外；又有多少穷姐妹为了保住饭碗只得借了高利贷、印子钱去送礼，结果背上了还不清的债。闯过了考厂关，这仅仅是跳进火坑的第一步。我们养成工成年累月在蒸笼般的车间里，在资本家、工头的皮鞭棍棒下，遭受着种种迫害和摧残，过着非人的生活。我讲的只是养成工过考厂这一关遭遇的情况，进厂以后的苦难更加说不清，数不完。那时候，我们在苦水里泡呀、熬呀，幼小的心灵中交织着无限的仇恨和希望，盼着出头的日子早点到来！

.....

我还沉浸在悲愤的回忆中，“妈妈，我错了。”我的孩子抬起头，脸上挂着晶莹的泪珠，带着羞愧的心情继续说：“现在我才真正懂得，能领到这件饭单是怎样的来之不易！在食堂里工作，也是党交给我的重任！”

“对啊！玲玲，你看，”我双手捧着代表两个不同社会的两件饭单说：“这件养成工用过的饭单渗透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在它上面凝结着工人阶级对旧社会资本家的仇恨。而你领到的这件簇新饭单呢，却寄托着毛主席对你们青年人的无限关怀和希望，……”

我的孩子一下子挺起胸来，急急地接着我的话说：“还需要我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决心，做好革命接班人。”

看到孩子思想的转变，从她的身上更看到了年轻人的成长，我由衷地笑了。在新社会，我越活越年轻，我要努力学习，提高路线斗争的觉悟，牢记过去的阶级苦，来激励我鼓起更大的干劲，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切力量。

上海国棉六厂工人陈师傅口述

厂写作组、林秀婷整理

汪铁插图

## “打盆”<sup>①</sup>童工的回忆

上海缫丝厂,是我童年做过工的地方。解放后,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被调到了丝织厂。离开老厂多年了,有一次我回去探望在旧社会一起当过童工的小姐妹。走进缫丝车间,这里大变样啦:只见一排排新式的机器整齐地排列着,缫丝车上的一只转盘在不停地旋转,转盘四周象蟹脚似的伸着几只小草帚,将开水中时浮时沉的茧子上的丝头自动寻出来;然后茧子被传送到机器的另一端,突然“扑”的一声,一只茧子的丝头被一个小零件自动地抓住了,又自动地被喂入到锭子上,雪白光亮的丝线就缫出来了。挡车工在一排排的缫丝车旁不慌不忙地巡回操作,从机器顶上吹下来的凉风,使人毫无闷热的感觉,地上

---

① 打盆——将茧子浸泡在盛有开水的木盆里,用高粱秆做的索绪帚迅速地打动茧子,将丝头寻出来,交缫丝工缫丝,这种工作叫打盆。

干干净净的，穿布鞋子走路也沾不到一滴水，……看着眼前的这一切，解放前缫丝车间的童工遭受种种煎熬的景象，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闪现：烧茧锅里的开水，热到一百二十度，“扑扑扑”地不停的上下翻滚，茧子在开水



中窜上窜下，“打盆”的童工用手伸进泛着气泡的开水里，把一只只茧子上的丝头寻出来，……一双手整天泡在开水里，烫得手背手心上都是血泡，十个手指头象烧熟的胡萝卜，吃饭时连碗都捧不住。俗话说：“十指连心”，疼痛得“打盆”的童工眼泪簌簌直流。那时候，资本家只顾剥削赚钱，不管车间的安全设备，只见车间里罩着白蒙蒙的一片水蒸汽，象刚掀开盖

子的蒸笼，闷热得人透不过气来；地上到处是水，工人赤脚穿着厚厚的木拖板，身上围着麻袋、草包在机器旁操作。资本家的爪牙“拿摩温”<sup>①</sup>露着一副凶相在机器旁转悠，监视劳动，看到工人手脚慢一点，跟不上下一道工序时，伸手就打人，或是夺过“打盆”的童工手里的铜勺，舀起开水就往身上泼，那一个童工没有吃过这种苦头！当时，工人都叫缫丝车间是“水牢车间”，工人真象是在“水牢”里过日子啊！看看现在的缫丝车间，比比过去，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我是九岁进缫丝厂（那时叫“湖丝栈”）做童工的。我爸爸妈妈原先是在工厂做工，这时失业了，家里生活很困难，一家人经常挨饿。咋办？我妈咬着牙东借西凑，托人向“拿摩温”送礼，我才进厂做童工学打盆。我天真的以为找到工作，有了生路，可以赚点工钱帮家里度饥寒了。可是进厂以后，幻想象肥皂泡一样很快就破灭了。

第一天上工，我半夜两点多钟就出门，从闸北的棚户区绕过苏州河，跑二十里路到普陀区的缫丝厂上工。我妈妈一路陪着我，一路叮嘱我，要我进厂做

---

<sup>①</sup> 拿摩温——对工头的另一种叫法。这种人是资本家雇用来对工人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的。

活处处小心。我的脚踏进车间，“拿摩温”就对着我上下打量，冲着我奇怪地问：“怎么生得这样矮小？”我当时确实生得又矮又瘦，踮起脚来，还差机器一截。为什么长得这样矮小？这是旧社会的苦难生活造成的啊！我出生在上海县的漕河泾，三岁时，国民党反动派要抓我的两个哥哥当壮丁，我们一家人赶快连夜逃到上海。到了上海，举目无亲，只好流落在街头。后来不幸冲散了，我成了孤儿，被收容进徐家汇育婴堂，受外国妯娌的种种虐待，过了一年人间地狱的生活。到了四岁，又被当作“商品”拍卖出来，跟着养父母拾柴火、捡菜皮，饿一顿饱一顿的过日子。才过六岁，就跟着大人到郊区七宝、大场一带背米……我小小年纪，为了生活就风里来雨里去，吃不饱穿不暖，过着苦日子，怎么能长高呢？资本家对“打盆”童工的剥削条件非常苛刻。其中一条，规定进厂三个月学打盆无工钱。这等于要白做三个月的苦工。在这期间，我苦做苦熬，起早摸黑，一天来回跑几十里路，手脚不停地干活，流尽了血汗，累得面黄肌瘦，到头来拿不到分文的工钱。三个月期满了，我学打两个盆，可是，一个盆的工钱却被“拿摩温”吞吃了。你流露出一点不满的情绪，她就折磨你，甚至借故停



你的工作。资本家、“拿摩温”这班吸血鬼就是这样剥削工人，靠工人的血汗养肥自己。那一年，我从夏天进厂做到冬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连妈妈借债送礼的钱也还不起。

现在工厂实行的是八小时工作制，那时，缫丝厂工人上班是“六进六出”——早上六点钟进厂，晚上六点钟出厂，一天要做十二小时；而我们“打盆”的童工就更苦更累了，要提早上班拎开水泡茧子，要晚下班洗刷工具，所以是“四进八出”。每天晚上回家，我累得真想躺下睡觉。但是苦的是家里买不起钟，上工的时间拿不准。晚上，我躺下睡觉，我妈就得坐在旁边守着。一会儿出去看星星，一会儿出去听听动静。约莫着时间差不多了，再把我叫起来。有一次，我妈夜夜陪我实在太累了，她打打瞌睡忘了喊我。我从破被窝里冻醒过来，听听外面的动静，附近的大饼油条摊头的师傅已经在忙着干活了，擀面棒敲得笃笃响。我想这下糟了，时候不早了，赶忙披上一件破棉袄，拉开门冲进寒风刺骨的黑夜里，踩着硬梆梆的石子路，一脚高一脚低的往厂里奔跑。心里在想：天又冷，泡茧子的热水供应又紧张，茧子泡不开怎么办？“拿摩温”又要凶神恶煞般地打人骂人了。我冲

进车间，麻袋往腰里一围，木拖板一套，就拎起两只木桶，象冲锋一样奔过去舀开水。大冷天，车间里被热气一蒸，白茫茫的一片，五步内看不清东西，高低不平的地上又结着薄冰，滑溜溜的；我正在庆幸自己拎到了两桶开水，不料脚下一滑，我摔倒在地上，“哗”地一声，开水浇在我的身上，烫出了一串串的大泡泡，全身火燎火烧的。我躺在地上爬不起来，又痛又害怕，挡车的朱阿姨等几个老师傅放下手里的活急忙跑过来，将我扶起来，帮我换了衣服，叫我坐在垫脚干活的木箱上歇一歇。在我贴隔壁打盆的叫“小苏北”的小姐妹赶快去帮我拎开水，好让我歇一会儿上车干活。刚好这时“拿摩温”到车间巡查，看我烫得浑身是伤，“嘿嘿”地冷笑了一声说：“你好休息休息啦。”意思就是叫我回家，以后不要来上工了。“拿摩温”一面说着，一面拔脚要走，一转身，看到“小苏北”打盆的那架缫丝车上断档了，车上没有丝头。她正咧着嘴骂人，发现“小苏北”手里拎着开水桶走过来，不由分说，举起手就朝“小苏北”头上打了一巴掌。

“你为什么打人？”小姑娘愤愤地说。

“拿摩温”在车间里打骂童工是很平常的事，想

不到小姑娘今天敢拿话顶她。歹毒的“拿摩温”抢过铜勺，舀起开水就往小姑娘身上泼，开水烫过的地方，立刻泛起一层血泡。挡车的朱阿姨看到这个情景，马上跑过来，用身体挡住小姑娘，气愤得涨红着脸，冲着“拿摩温”说：“孩子这么小，打成这样子，实在太狠心啦！”手里拿着铜勺想继续砍人的“拿摩温”，抬头望见那么多的挡车阿姨怒着双目瞪着她，手才缩回去，自找“台阶”下坡地说：“饶你这一次。”悻悻地走了。

我被开水烫得全身是伤，“拿摩温”还这样不讲理的要停我工作，我气得真想扑过去咬她几口才解恨，无奈当时我浑身象火烧一样滚烫，人瘫着不能抬手动脚。我刚刚给“湖丝栈”老板白干完三个月的活，才领到一点微薄的工资，现在出了工伤，“拿摩温”就借故要我“休息”停工，这些吸血鬼多凶残呀，他们伸着一只一只的手随时都在等着掐我们童工的脖子。我妈知道后，没有别的法子可想，只好又借了高利贷买东西送礼，“拿摩温”才肯了事。我前后做了四个月的工，到手的一点工钱，还不够两次送礼花费。

在旧社会，我们做童工的，生活真是苦透苦透。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湖丝阿姐<sup>①</sup>真苦恼，双手开水泡，起早落夜做断腰；萝卜干当菜，六谷糊塞不饱；一年做到头，年关更难逃，……”

育婴堂外国妘妘留在我身上的鞭痕，打盆捞丝头开水烫的疤，“拿摩温”用铜勺砍的伤，撩起衣服，抚着身上处处伤痕，我真恨得泪水尽往肚里咽；但是，资本家、“拿摩温”的折磨，苦日子的煎熬，使我变得倔强起来。车间里，挡车工朱阿姨等几个老师傅对我们童工处处照顾，常常护着我们，我学朱阿姨她们的样，胆子也大了。

打盆的童工手头有三样工具：索绪帚、铜勺、木桶。索绪帚是理丝头的，铜勺是舀茧子的，木桶是盛茧子的。“拿摩温”常常拿这三件工具打童工出气，稍为不如她的意，拿起铜勺砍我们，舀起开水泼我们，拎起木桶摔我们。我们恨透了资本家、“拿摩温”，也经常摔工具来表示我们的反抗和发泄心头的愤恨。

我十一岁那年，有一次，一个工人被“拿摩温”押着游车间，颈子上挂着一绞丝，“拿摩温”一边押着工

---

<sup>①</sup> 湖丝阿姐——旧社会对缫丝厂女工的统称。

人走，一边用威吓的口气喊：“谁做出坏条份<sup>①</sup>，就象她一样游工场。”工人们看见了，都骂“拿摩温”是雌老虎。我看着游工场的阶级姊妹从我身边走过，仇恨一下涌上心头，就拎起木桶狠狠地往机器上一放，滚烫的水珠从木桶里飞溅出来，手里提着鞭子、神气活现的“拿摩温”正好摇摇摆摆地走过来，水差一点溅在她的脸上。

“拿摩温”吓了一跳，走路一个踉跄，气得歪着脸，瞪起三角眼瞅我；她见那个工人走远了，鞭子在空气中“啪啪”地抽了几下，才无可奈何地赶上去了。朱阿姨走过来，用赞许的眼光瞧着我，拍拍我的肩膀笑笑。她又关照我要当心，提防“拿摩温”进行报复。

果然不出所料，过不了几天，“拿摩温”不知从那里拣来一绞坏条份，在我面前一晃，用鞭子指着我，无中生有地说：“你昨天打盆泡烂了茧子，纰出了坏条份。”说着，要罚我顶着木桶跪在工场里“示众”。我心里不服，冲着她说：“你不要坑害人！”“拿摩温”看到我敢当面反抗，气得满嘴尽骂下流话，随手举起木桶要往我身上砸。朱阿姨一个箭步跨过来，拉住

---

<sup>①</sup> 坏条份——丝的粗细用条份来表示。坏条份是指丝的粗细不匀。



木桶喊着：“不能这样打小孩。”朱阿姨一喊，其他的挡车阿姨也围过来。“拿摩温”看到我们这边人多势众，怕惹不起；大家停下手头的活，影响生产，老板追问起来又不好交代，她就边走边威吓的叫嚷着：“你等着瞧我老娘的厉害！”结果，那次“惹事”，无缘无故的硬扣下我五天的工钿。

我在“湖丝栈”的遭遇何止这些呢！残酷的剥削象一根无形的锁链，束缚得穷人连气都喘不过来。

但是，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资本家、“拿摩温”的剥削迫害，激起了我们缫丝工人的仇恨和反

抗。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缫丝厂就发生过几次罢工斗争。厂里罢工的消息一传进车间，朱阿姨就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我拎起木桶一摔，车间里“打盆”的童工“呵”地叫起来，挡车的阿姨就陆陆续续地关车。资本家看到工人罢工闹事，就派一批亲信爪牙到处走动，监视工人。我那时十二三岁了，由于经常挨饿又过度劳累，人长得矮小，还没有新社会八九岁孩子的身材高。但人小大家不注意，朱阿姨叫我秘密传递罢工消息时，我就拎着一个木桶，借着取茧送蛹的机会，悄悄的把行动的时间和信号传给一个个工人，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容易躲过那些坏家伙的耳目。罢工斗争中，当工人代表和资本家谈判时，我就钻进人群中去打听消息，回来告诉大家，好商量对策。罢工进入高潮时，我就睡在厂里，跟老工人上老板家进行斗争，要老板答应我们提出的条件。由于我胆子大，又敢讲话，老工人都亲热地叫我“小快嘴”。

我们工人坚持罢工斗争，资本家眼看着缫丝生产的旺季受到影响，不得不被迫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如要给工人增加工资，不准迫害工人，不准虐待小童工，等等。但是狡猾的资本家并不甘心，到了



缫丝生产的旺季过去之后，又把工人的工资降下来，并照旧对工人、童工进行人身折磨和政治迫害。不过，通过罢工斗争，我们工人的心齐了，看到资本家、“拿摩温”迫害工人，大家就站在一起

进行斗争。在缫丝厂，资本家不断地压迫剥削工人，工人就不断地起来反抗斗争。

.....

过去这里发生过的一切，记录着资本家对工人、童工残酷剥削的罪恶，也记录着工人、童工起来反抗斗争的历史。今天这里





起了很大的变化，是我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的反映，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还要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上海第二丝织厂工人周师傅口述

裘愉发整理

吴 肇插图